

文化與藝術

全面提升生活文化與環境文化的品質

為檢視臺灣在今後十年如何從貿易大國邁向「生活大國」，本章分別自環境文化與生活文化角度，整合文化與藝術領域的相關議題，針對國民生活品質與公共空間營造美化，及其跟生活品德、生活品味的關係，提出政策性建議，為二〇二〇文化願景拋磚引玉。環境文化中包括日常生活環境、休閒生活環境與度假生活環境；而生活文化則強調生活品質與主觀幸福感的關聯性，進而討論生活倫理與生活方式如何影響一個地區的生活品質與其適居性。據此建議將全民美感教育納入終身教育網絡，並政策性鼓勵全家性活動，宣導現代生活禮儀，擴大辦理國際藝文節慶活動，規範公共空間設計，加強公共建築管理，並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

召集人：郭為藩 漢寶德

目錄 文化與藝術

壹、現況檢討	
一、從貿易大國邁向生活大國	321
二、檢視臺灣的生活品質，提升生活品德與生活品味	322
三、面對文化全球化的情勢，建立「文化認同」的共識	323
四、擴大展演藝術獎助，安定藝文創作人才生活	325
貳、問題分析	
一、環境文化方面	327
二、生活文化方面	343
參、政策建議	
一、環境文化——政府能為環境品質做些什麼？	351
二、生活文化——政府倡導生活品德的可行做法	356
肆、目標設定	
一、政府機關近年設定的發展目標	366
二、文化願景——二〇二〇	367

壹、現況檢討

一、從貿易大國邁向生活大國

臺灣自一九八〇年代採取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策略，順應世界市場於代工產業上的需要，在對外貿易方面乘勢躍升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讓舉世刮目相看；並在經濟自由化的政策引導下，同步帶動政治民主化與社會多元化，使臺灣在二十世紀末期全球化的潮流下，迅速與世界大環境的變遷接軌。由於國民所得快速升高，配合出國旅遊日趨便利，臺灣地區的民眾前往國外大學進修、觀光旅行、開會洽公、經商創業的人數大量擴增，臺灣在世界各地的能見度已遠遠超越同樣國土面積與人口數量的國家。加以外匯儲備遙遙領先，Made in Taiwan的商品在世界市場到處可見，不單從每年外貿總額的統計充分顯示，各國媒體的報導與國內新聞宣導也一致肯定，臺灣已臻升為世人心目中的貿易大國是不爭的事實，國人亦有此種心理認同。

一九九〇年代開始以後，由於中國大陸的開放政策逐漸落實，兩岸人民的貿易關係顯著改善，臺商因經營事業的需要到大陸地區設籍創業的人數粗估已超過百萬，而一般民眾每年前往中國大陸的人數劇增，貿易考察與磋商旅行亦絡繹於途，臺灣在大陸地區的投資帶動大陸市場成為世界製造業的重鎮，全世界主要的跨國公司差不多都到大陸設立分公司或生產線；對岸在國際貿易的地位不僅遙遙領先臺灣，且已躍登世界第三經濟體，外匯存底亦高居全球第一。相形之下，臺灣地區對中國大陸在貿易往來的依賴度卻逐漸加深，兩岸經貿關係漸成臺灣對外貿易的主軸。臺灣在近二、三十年來享有的貿易大國盛譽雖然未墜，但是發展瓶頸漸露，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優勢亦有相對衰退跡象。究其主因，對岸外銷導向的產業突飛猛進，與臺灣本土產業重疊性日增，而韓國也迎頭趕上，東南亞若干國家及印度亦正快步追趕。今後在貿易優惠協定的簽署方面，臺灣因外交情勢所迫漸居劣勢。因此，未來十年在臺灣經濟上尚能保持榮景的情況下，如何另闢蹊徑，尋求脫胎換骨之道，自我超

越，繼續保持在其他方面較長期性的優越地位，實是當前國人必須嚴肅以對的課題。

在當前兩岸關係密切而兩岸交流「多元化」與「鬆綁化」的大情勢下，欲求反向運作或轉移重心的部署似乎是極其艱難出現的情況，即使是政權再度輪替亦然。面對這種幾乎無法另作選擇的困境，國人固然應深加警惕，但亦不必悲觀徬徨，尤其是執政者為然。因為在對外貿易之外，臺灣社會積六十年的經驗，在所謂「軟實力」方面累積相對於中國大陸的若干優勢，值得加以開發；此種「軟實力」在文化上亦然。由於兩岸一海之隔，但同文同種，均以中華文化為傳統生活文化的基礎，值茲兩岸通航以後，大陸觀光客蜂擁來臺，兩岸文化交流更趨頻繁，如何塑造臺灣成爲一個藝文方面的美麗島，引導中國大陸在生活文化方面的質變，應爲今後文化政策最嚴肅的課題，這正是本章提出「讓臺灣邁向生活大國」這一主題的主要理由。

二、檢視臺灣的生活品質，提升生活品德與生活品味

大體而言，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其國民年平均所得超過二萬美元以後，其居民在衣食住行育樂等生活基本需要的滿足應已無虞匱乏；但是這些層面的生活水準指標卻不見得代表這個國家或地區的生活品質。因為在另外一些層面，包括安全感（治安良窳、社會保險、災害防治等等）、社會關係（人情味、公德心、弱勢照顧、休閒生活等等）以及整個環境文化品質（公共空間的開發、藝文生活的充實、視覺景觀的品質），也是所謂「適居性」的權衡因素，更不必提抽象且相當主觀的所謂國民的「幸福指數」、「快樂指數」等等理念。近年來不少國際性刊物每年常進行「世界最宜居城市」（The World's Most Livable Cities）或「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的評比。這類排行榜雖如同學術界所謂「國際一流大學」的評比一樣，飄浮起伏不定，且嫌主觀，但亦意味著仍可藉助一些指標來區分生活品質（兼及生活品德與生活品味）的優劣。臺灣地窄人稠，國土過度開發，自然災害頻傳；

雖然農業富饒，山川秀麗，可惜居住條件形格勢禁，大多地區相當壅塞髒亂。不僅交通雜亂、停車占據街道；且就視覺環境來說，招牌看板醜陋，違章建築侵占公共空間隨處可見。這些情況自然影響到臺灣居民的生活品質，有待全面改善。誠如美籍趨勢學者大前研一在接受《天下雜誌》訪問時談到「形塑生活者大國」（大前研一，二〇〇九）指出，臺灣應該從「產業導向」轉到「生活品質導向」，當務之急是將基礎建設做得更好——河川弄乾淨、空氣弄新鮮、清理海岸、都市更新。因為政府的任務乃是在財力許可範圍內提供給居民一個舒適、安全、有秩序、有美感、有文化特色的環境。

臺灣雖然從國土面積言是小國，不妨以「生活大國」為努力目標，北歐小國如瑞典、丹麥、挪威、芬蘭，西歐小國如荷蘭、愛爾蘭、瑞士、奧地利等，都配譽為「生活大國」。這些國家在前述生活品質的全球性評比中經常是名列前茅，成為世人喜歡前往或定居的地區，經常在最宜居城市排行榜中榜上有名。特別是近來全球氣候變遷日漸顯著，隨著地表暖化、海平面上升的危機，如何規劃低碳城市、永續產業，兼及替代性能源的開發、倡導都市綠建築，並充分顧及生態環境的保育，以及培養地景建築師（Droege, 2006），應為今後國內文化建設的新課題。

三、面對文化全球化的情勢，建立「文化認同」的共識

過去十餘年來的文化全球化過程，形成文化疆域模糊化、文化產物商品化、文化經營企業化、文化消費流行化的現象，對臺灣在地文化的發展及國民的明確文化認同頗多衝擊。值茲今後兩岸關係趨於穩定開展，文化交流合作更加頻繁，文化認同的課題勢將更為凸顯。目前政府的文化政策，一方面正視全球化過程透過各類傳播媒體對國人生活形態與思想方式滲透影響的現實，另一方面也未怠忽扶植本土產業與原住民文化的永續發展。然而當兩岸文化交流的藩籬一旦撤除，大陸觀光客蜂

擁到來而漸成為臺灣主要觀光客來源以後，整個國內文化生態環境勢將不變。例如國內長期扶植的國際演藝團隊是否會北移而常駐大陸重要都會舞臺演出？對岸演藝團隊是否以地利優勢、大量來臺展演，逐漸排擠歐美著名團隊來臺灣演出機會？又如面對中國大陸、日、韓文化產業蓬勃發展的氣勢，如何扶植尚在嫩芽階段的文化創意產業，開拓國際市場並增進其競爭力，這些保育本土產業及演藝團隊的策略性措施，隨著兩岸的穩定開放而迫在眉睫，成為文化行政當務之急。

但是新情勢固然浮現出本土文化產業競爭力的課題，同時也揭開國人文化認同何去何從的嚴肅問題。政府遷臺以後，一直以復興中華文化的基地自居，並在教育與文化政策方面，大力宏揚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國人在文化認同方面也非常明確，尤其是大陸地區在文革十年期間對傳統文化的倒行逆施，適與臺灣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成強烈對照。一九八〇年代後期，臺灣地區解嚴帶來言論的充分開放，顛覆文化政策的偏頗論調隨時可聞，文化論述與藝術表現呈現百花齊放的新局，但是以聳動視聽為能事者亦不在少數，尤其是部分對文化認同質疑的學者在新媒體推波助瀾下，以相當兩極化的觀點，催化臺灣社會多元化的傾向。另一方面，貿易全球化亦催生一大批混雜文化認同的族群：其中包括數十萬臺商及跨國公司臺籍幹部為主的旅行常客，亦不乏有企業領袖與社會菁英，他們經常僕僕風塵於國際航線上，習於時差與日夜顛倒的「空中飛人」生活，也多數嫻熟一種以上外語，經常攜帶輕便行李，以旅館為家。這一族群因疆界意識模糊、能適應多元文化環境的變異並習於調適文化差異帶來的新生活方式，很自然地在態度、觀念及人格特質上表現出「多文化的認同」（multicultural identity）。事實上，在當前這樣一個幾乎完全開放的臺灣社會，一般民眾日夜接受主要媒體的洗禮，要塑造一種文化認同的固定類型並非易事，何況國內媒體多年來政論性節目旗幟鮮明，亦高談闊論文化認同的課題。相形之下，公共文化節目在國內媒體生態環境下，反而覺得窒礙難伸，缺乏滋養的成長空間，公

共文化電視系統尤其相當凋萎，對一般觀眾國際視野的開拓助益有限，頗令有識者氣餒。

值茲全球文化產業蓬勃發展，文化觀光事業因交通便利而如日中天，臺灣地處東亞航線要衝，且與中國大陸的廣大客源同文同源，自然有較優厚的條件來擴展文化版圖，並乘勢問鼎文化的新中原。相反的情況，臺灣倘若在文化事業的開拓缺乏宏謀大略，則可能在中國大陸、南韓及日本霸業的環伺下，被邊緣化，甚或淪為文化的次殖民地。臺灣的優勢在於其在地文化雖源自中原文化，唯政府遷臺六十年來不同族群與源自中國大陸不同地區風土人情的文化養分，逐漸塑造出在地文化的特色及相對於當前大陸華夏主體文化典型的若干優質成分，如同新品種或臺灣的改良水果一般，倘能有系統地結合文化創意與現代視聽科技，對嚮往中國文化藝術的觀光客及一部分文化素養較高的大陸旅客，將有耳目一新的吸引力。但是大前提是臺灣本身的文化認同必須相當明確顯示，這些新氣象及多元創意所展示的「臺灣精神的中華文化」（借用馬總統二〇〇九年國慶文告的主題用語），或是具有臺灣在地特色的中華文化；其實也可視為「文化在地化」在文化藝術上的具體例證。

四、擴大展演藝術獎助，安定藝文創作人才生活

一九九三年訂頒的「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是行政院文建會成立以來，與「文化資產保存法」並稱最重要的兩項文化立法。前法除了為現已運作的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立取得法源外（文建會曾對該基金會分年編列六十億元臺幣捐贈），同時對國內藝文活動的稅賦減免及公共藝術的設置亦有所規範。該法在研擬期間原有設立國家藝術院的構想，俾對藝文創作方面有卓越成就的藝文界人士，在其生前就給予應有的專業照護及禮遇（類似法蘭西學院的藝術院、日本藝術院及瑞典皇家藝術院等，可授予院士榮銜並終身照顧）。可惜此一部分構想並未實現。此外，該法對藝文活動稅賦減免及藝文專業人士照顧方面的條文亦嫌不足。國外（如法國）對藝文專業人才特別重視的是急難照顧以及健康保

險、意外保險及退休制度這些領域。因為藝文專業人士大部分屬於自由業者，通常以創作與演出為主要收入，生活所得並不穩定，一年中常有一段時間賦閒，且無法享有一般專業人士在退休後的固定津貼或年金保障。所以有待政府建置社會保險體制予以照顧，藝文創作及文創產業若干部門專業人才方能安享餘年。

另一方面臺灣地區不僅夠水準的展演場所相當不足，且缺乏具有國際聲望的大型國際藝術季節活動，使得多數國內演藝團隊必須尋求海外展演機會。加以前述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獎助資源有限，而文建會扶助國際演藝團隊方案的補助對象也僧多粥少，所以造成國內藝術團體規模不足，且相對競爭力薄弱。至於引進國外藝術團隊來臺表演方面，由於基本觀眾有限，且中南部展演市場的票價難以維持起碼成本水準，導致引進國外團隊的經紀公司經常有捉襟見肘、甚至虧損連連的情狀。何況臺灣表演藝術市場嫌小，每項演藝節目無法維持相當演出場數，更增加引進高格調國際團隊來臺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界與公益團體的贊助乃是必要的配合。可惜受到稅賦減免及優惠的限制，一般企業團體的贊助意願並不熱烈。因此，再次全面檢討文化藝術事業獎助的體制並進行修法，亦為政府面對文化全球化有待採行的近程措施。這些年來，臺灣地區難得「含辛茹苦」培養出相當充沛的藝文創作與產業運營人才；倘若短期內無法改善其工作條件，提供較優厚的生活照顧，恐怕會楚才晉用，逐漸為對岸的新興市場所吸納。學術人才的流失，政府已有較充分的警覺（例如高等教育的五年五百億方案），但是藝文方面的留才計畫迄未見任何端倪，令人焦急。

貳、問題分析

我們都知道「文化與藝術」是文明國家的冠冕，但是政府的公權力與「文化與藝術」之間的關係應該如何，則有全然不同的看法。西方國家多持有政府不應干預文化的態度，故美國至今沒有文化部。歐洲國家雖有文化部，也多是以支持藝術界為基本政策，共產國家的文化部為意識形態宣導機構，幾為思想箝制的國家機器。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部則多以衛護民族文化為職志。

我國的文建會自成立後即有「使命」的困惑，然而開創時即有「提升國民精神生活品質」以平衡現代生活物質化的大方向。過去二十年來歷任政府提出不同的政策，但多可包容在「生活文化」此大前提的範疇之內，大體上說，內容可分為生活品味與生活美化。

因此本報告以此為綱領，把生活文化分為硬體與軟體論述。硬體即指與生活密切相關的環境文化，軟體則指涉及品德與美感的制度與活動。

一、環境文化方面

（一）環境文化的意義

人類自混沌中開拓文明的領域，基本上是克服環境障礙的過程。環境很自然的被視為敵人，應加以征服。我國有「愚公移山」的故事，可以說明在愛好自然的文化中，同樣有改造自然的觀念。

在文明進展中，征服自然的觀念漸融入利用自然的意義，這時候克服自然環境就是建造人為環境。一旦「人」的價值成為環境塑造的基本要素，環境就逐漸成為人類的文化與歷史最重要的載體。生活環境中人為的成分隨著工業技術的進步日益增加，到今天，人類的一生已經大部分生活在人為的環境中，自然環境幾乎也成為人為環境的一部分。環境因而與精神文明不可分割。

在過去，環境這個人類文化中的重要課題從來未被重視，因為各民

族大多把自己的居住環境視為當然。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多有討論環境的論述。直到十九世紀，歐洲的工業化破壞了傳統的生活方式，使得廣大的民眾不得不丟棄農村環境，進入陌生的工廠集中地區。其結果是出現人口大量集中、居住建築不足、衛生情形嚴重等社會問題。環境再次影響到人類的存亡。這種情勢一方面間接的促生了社會主義運動，造成二十世紀世界的動亂，另一方面則產生了都市計畫的科學與現代建築的革命，終於帶來了對人類的環境文化的覺醒。

環境的專業強化了人為環境創造的觀念，原以為環境文化的問題只是居住空間不足或分配不均，與生活功能組織效率的問題。到了二次大戰之後，西方國家大量興建國宅並開闢新都市之後，才發現環境文化有更深刻的問題在。環境之形塑原是與人類精神生活息息相關的，不能簡化為理性的空間數量與功能的。

行為學者們認真的研究，發現人為環境的文化問題，首先是環境調適問題。人類都有自成長經驗中習慣的生活環境形態，當環境改變時，必須調整自己的習慣以適應新的環境。人人都有調適的能力，但調適會造成心理的壓力。學者們發現，人類與其他動物一樣，調適有一定的限度，超過了某一限度，會造成生理與心理的失常，而影響到人格與行為。比如高密度居住環境中，如缺乏隱私空間，會形塑失去人倫的性格如亂倫、凶暴、爭鬥，甚至產生自殺的傾向。故現代社會中，心理性疾病大量增加，在文學家的眼中，現代社會幾乎已沒有心理完全平衡的人。

他們發現的第二個環境文化問題，是民族與環境的關係。二次大戰後，關心環境的人類學者自實地研究中了解，不同的民族，在其文化傳統中有獨特的環境觀，不會因實質環境的改變而改變。它是一種無形的力量，在環境調適的過程中必須加以尊重。舉例說，「領域感」是環境文化的重要因素。有些民族的領域感較強，其領域圈較大。領域感較弱的，其領域圈較小。前一類民族比較好戰，注重個性，重視隱私；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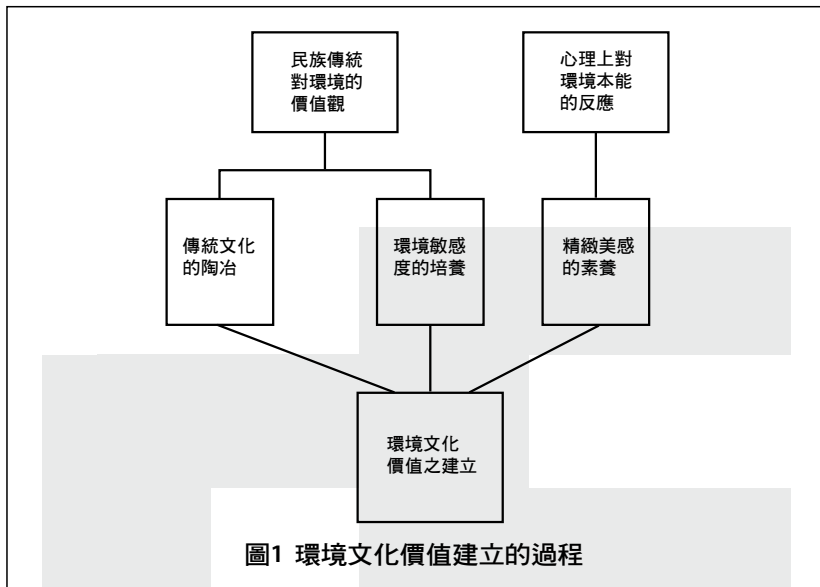
類民族比較喜愛群體活動，重視人間的親和關係。

從這些純學術性的思考，後來的學者開始注意到各民族傳統中居住環境的意義，使建築學者接受了「民族領域」的觀念，視居住環境為生存空間，亦即各民族根據自己的需要所經營的安適空間。並把海德格的「存在的立足點」（existential foothold）的觀念發展出「地點」的觀念，環境文化就是「地點」的創造，就是民族空間的實現。

另一個重要觀念是形式的價值，造型的觀念被「有意義的形」所取代。每一種「形」都是有象徵意義的，與歷史與文化不可分割。由很多具有象徵意義的「物件」創造出特有的地點，才能產生一個具有獨特民族性的環境，有精神價值與文化內涵的環境。

學者們對環境文化視為一種不可不遵循的力量，但是自人文主義傳統來看，文化是人所創造，其價值可以自人文的觀點去判斷，因此也可以使它變成一種主動的因素，由之我們可以創造有利於人間的居住環境。我們可以把心理上有利於身心的條件，與民族所喜愛、所樂見的環境條件，以藝術的手法呈現出來，並有意的規避那些不利的條件，創造出人類理想的居住空間。這是環境設計專業的理想。邱吉爾說，「人塑造了空間，空間亦塑造人」，說明了人與環境互動的關係。因此塑造具有正面人性價值的空間，可以協助塑造更具有人性價值的人格。所以具有正面價值的環境，可以使文化不斷的提升。

所謂正面的環境心理因素，仔細分析起來，實際上就是美感價值。學者們看到的負面因素會造成人格的損傷，美感價值則可提高精神素質。可是這種價值判斷一方面固然來自本能的反應，另一方面則需要美感素養。同樣的，民族文化的價值觀，比如對山水的觀察方式，實際上是一種獨特的美感價值。負面的民族性，諸如纏小腳、抽鴉片，是文化的病態，必須通過傳統文化的陶冶才能掌握到正面的價值。這種正確的價值觀一旦建立，可以產生良性循環，不斷的創造出更有利於人生的居住環境。



這裡用一個簡單的圖示（圖1）說明環境文化價值建立的過程：

自此圖示來看，環境文化的意義只有在一定的全民教育發生效果後才能顯現出來。

（二）環境文化的內涵

環境因人之存在而產生文化，故探討其內涵，亦必自人之行為，亦即人對環境的關係，來了解其意義。

人與環境的關係，大體說來有以下三類，首先是平日生活所需的環境，這是我們最不能割離的環境，因此也是最能凸顯生活文化的環境。其次是休閒生活所需之環境。休閒亦為生活的一部分，但偏重於精神面，所以休閒所需的環境更能與文化的精神面，尤其是文學與藝術相連結。第三是度假時所需之環境，此時為了暫時脫離正常的生活，進入幻覺的世界，故屬於遊戲性的文化，這是現代人所獨有的觀光文化。

1. 日常生活的環境

在文明社會中，人類日常生活所需的環境，都是建造的環境，大體上包括居住建築，以及建築所延展而成的街巷、城市等。這是大部分人一生度過的地方，故最能表現一個民族的環境文化。

居住建築是環境文化的核心，它代表了居住者的生活方式，家庭組織與社會關係，具有明確的象徵意義。一個民族的居住傳統，塑造了這個民族的空間觀念與社群關係，甚至民族性。即使傳統居住建築漸失，空間價值觀一時也不會改變。需要經過數代才能有所改變。

以中國傳統四合院為例，由於封閉式的牆壁反映了以家族為單位的社會組織，以及對外人所採取的猜疑與不信任的態度。圍牆使傳統中國人的人生觀是退縮的、保守的，對牆外的一切漠然視之。在院落之內的親密人際關係是不重視個人隱私的，也不重視個人的衛生條件。

有趣的是，傳統的四合院建築，不論南、北各地均有式樣上的差異，但都有一定的美感水準。可是傳統的空間是充滿象徵意義的。如果不是為了維護家族倫理關係，就是為了求福求壽。結果是它的美感價值被象徵價值所掩蓋，不為國人所注意，對於考究的建築，多以「富麗堂皇」形容之，以華麗、高大為美。

臺灣的居住建築除中國傳統之外，有近兩代之日本建築的影響，因此中上層社會有居住日式房屋之經驗，日本之居住文化部分融入臺灣生活之中，日式素樸的審美觀亦部分為臺灣民眾所接受。

自六〇年代開始，臺灣有西式的居住建築出現。當其始，由政府引進歐洲新式國民住宅的設計，西方的公寓是核心家庭的居住單元，並沒有包括家族空間，單元中以起居室為中心是可以被接受的，浴廁與廚房等仍無法被視為可以安排在住宅中的房間，開始時安置在公寓的後面。隨著經濟的成長，到八〇年代，真正的西方國民住宅的室內空間才被逐漸接受。但室內、外的視覺文化仍受傳統負面之影響，有顯著的品味差異。

建築的外觀在都市居住環境中即延展為市街。我國自宋代以來，漸漸放棄封閉型的「坊里」的組織，改採開放型的街巷的制度。如同在宋「清明上河圖」中所見，街道為商業活動的空間，市街逐漸形成城市的中心。這樣的發展與美國十九世紀發展出大街（main street）的市鎮觀念是相近的，把動線與日常商業活動連結在一起，與歐洲大陸早期以廣場為中心，交易集中於廣場的觀念是完全不同的，市街化的城市生活環境，形成住商合一的文化，是現代中國人所喜愛的生活形態。

眾多市街組織為城市。但是自從城牆自城市中消失以來，國人對城市的觀念非常模糊，因此對城市缺乏意象，這是全世界現代城市面臨的問題，所以今天的城市環境文化的重點似乎在塑造獨特的中心意象。自中心意象引申到市街的通道意象，是組成現代城市文化的主要架構。

當然，獨特的建築風格在城市文化中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為對一個城市的印象常繫於其主要地標建築的美感水準。歐洲的市鎮以教堂或市政廳為地標，若干地標建築多為建築史上的重要作品，成為該市市民之驕傲，也常常成為該國的重要紀念物。

2. 休閒生活的環境

在傳統社會中，民眾大多貧困無知，沒有休閒的觀念亦無供休閒用之特殊環境。但是中國傳統的富有階級，崇尚文人的生活，休閒方式有靜態的室內的藝術與文學活動，兼及於琴棋、詩酒等，亦有動態的走進大自然，以山水為師的休閒活動。然而國人傳統的休閒仍以靜態為主，大多可在圍牆內的住家中完成。

西方文化中，休閒活動以動態為主。中世紀時代，對於自然是畏懼的；文藝復興後，乃走向大自然，使日常生活空間逐漸與自然景觀融為一體。為了使居住環境與自然環境相結合，西方環境文化在十七世紀後即有成熟的公園的觀念，使自然景觀成為休閒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是把封建貴族莊園的精神納入密度較高的城市中的作法。對於貧困的市民來說，公園是一種奢侈。到了十九世紀，反映在印象派畫家作

品中的巴黎公園景象，公園已成為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歐陸的公園是把自然組織到建築秩序中，所以公園的人為環境的色彩濃厚，為嚴格的幾何形，其目的在延伸建築壯麗的美感。但英國是一鄉野的文化，貴族們很自然的把田野的風光帶進城市，因此英國的休閒的活動是動態的。鄉野間進行的馬術與狩獵不容易進城，但可以在上面躺、臥乃至奔跑的草原很容易納入公園之中。一種非常流行的市郊活動，是以鄉野景觀加美麗草坪的運動場：高爾夫球戲。這是現代城市上流社會的休閒活動。

中國與日本的休閒環境以庭園為主，這是居住環境的一部分，其規模完全視主人的財富與社會地位而定。它的假想是主人，或主人及其友人，優遊於庭園之內，欣賞其中特別塑造的山水與花木，甚至亭臺樓閣，所以中、日的庭園在本質上為詩文與繪畫的再現，使主人可以步入想像中的環境，是很特有的生活文化。後期的中國園景以奇石為主體，日本園景則以樹木造型為主，說明了兩種文化在本質上的差異。臺灣由於歷史上的傳承，頗有融合兩者的例子，形成臺灣獨有的園景文化，雜亂無章，缺乏視覺美感的思考。

3. 度假生活的環境

今天是交通發達、經濟富裕的世界，離開居住地點，到遠方旅行的度假生活，已成為大眾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觀光環境亦可顯現一國之文化特質。

度假的主要目的是暫時逃離日常生活的煩憂，紓解緊張心情，以便重新回到工作崗位。逃離的心理常常需要與平日的的生活拉長距離，故觀光環境對遊客言，特別重視新奇的經驗與美好的回憶。對提供觀光資源的地區來說，當地文化正是外來者尋求新奇經驗的對象。所以每一民族都是其他民族的觀光資源，也是其他地區的遊客，觀光度假遂成為現代生活中文化交流的主要源頭。一個國家是否能吸引國際的大量遊客，端視其獨有的文化資源是否被完善的維護與大力的發揚。

與環境文化有關的觀光環境，主要是歷史性市鎮與建築，異文化的傳統居住空間，可以增加知識，又可滿足好奇心，最重要的是獨特的藝術風貌。對本文化而言，同樣有觀光價值，因為已經消失的古文化，雖仍有傳統的熟悉感，但已只有微弱的記憶關係，與現代生活已有距離，故亦有休閒與尋奇的心理作用。這是自上世紀六〇年代以來，西方國家致力於傳統環境保存的原因。

受美國商業文化影響的度假環境，是虛幻景觀。自從迪士尼樂園開張以來，現代人為兒童夢想創造幻境，以科技方式滿足新奇、刺激的需要，這種衝擊已造成生活環境科幻化、布景化的觀念。

（三）國內文化環境存在的問題

國內對於環境文化之品質缺乏學術性之研究與探討，本文之報告為平日觀察所得，未可視為定論，僅可供關心文化者之參考。

1. 日常生活環境的問題

過去半個世紀，臺灣的建築與都市環境，已自前工業社會狀態逐漸發展為後工業之狀態。由於發展快速，為居住環境帶來了很多問題，其中視覺品質仍嫌貧乏。

一般說來，前工業社會以農村及小型市鎮為主，建築則為傳統材料與技術所建造之合院，視覺品質甚高，但居住之滿意度較低。日據時期已開始的早期工業化，以國營大型工業為主，尚未影響民眾生活，但對人民生活的期待已有所影響，市鎮中之日式或西式建築成為期盼的目標。戰後因土地改革而開始的工業化，使民間工業逐漸成長，由於工業化帶來的初期城市化，造成環境的惡化，其過程與西方在十九世紀時類似。

七〇年代看到城市內傳統建築文化被破壞，粗淺的現代建築的移植，造成市鎮建築環境的混亂。特別嚴重的是此時各城市均為違章建築所苦，違章建築的來源有二，一為大陸來臺難民所搭建的臨時建築，一為鄉間因工作來到城市之移民所搭建，環境之惡劣不言可喻。政府則

在外國戰後興建國民住宅的風潮影響下，開始在新開發地帶建造西式住宅，隨著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市區老屋逐漸為西式公寓所取代。都市環境新舊雜陳，開發商在混亂中建造的中產階級住宅漸成為城市中主要的組成元素。連帶而來的是傳統文化中的負面因子，如屋頂加建、鐵窗、招牌等華人現代環境中的通病，存在至今。

九〇年代，臺灣工業化社會環境逐漸呈現成熟狀態，各城市之違章建築陸續清除，所占有之通路與公園大多被依計畫開闢，臺灣進入富裕時代。後現代之環境需求亦漸出現，首先是代表財富的高層電梯大樓在臺北市的林蔭道上出現，其次是懷舊的情緒促成對傳統建築保存的覺悟。但是保存似為時已晚，大樓建設仍為開發商之操作，故整體都市居住環境仍有開發中的感覺。

進入二十一世紀，臺灣普遍有再開發的趨向，一方面向市郊發展，一方面對戰後的新建進行再發展的計畫，亦即拆除低層建築，改建高層大廈。由於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財富，臺灣各大城市環境逐漸西化，有緩慢進步的現象。但因缺乏整體發展計畫，一切仍由開發商主導。

因為都市發展缺乏完善的計畫，市郊的高層建築發展，以政商勢力結合的方式自由開發，故都市有不斷市郊化的趨勢，而呈現另一種視覺環境的混亂。由於近年來，貧富不均的情形逐漸嚴重，城市不同區域間形成品質對比強烈的環境，房價亦有極大差異，市區內的建築環境缺乏空間整合的觀念，市街景觀的風格並未形成，且有人行道無法貫通的問題，遑論市街空間之美感。

公共建築原是都市的視覺焦點，故被視為都市環境之靈魂，但近年來的公共建築之計畫，已偏離都市中心區域，而上世紀發展期時所建的重要建物，均缺乏視覺美感，無法擔當重任。

一般說來，各城市的新開發區，因在數年內完成，環境品質逐漸提高，高價位之居住建築亦漸國際化，但缺少獨特風格，完全犧牲本土文化風貌。

新居住環境之西化帶來人際關係的改變與家庭倫理的解體。自早期合院的家族集居方式，演而為連棟透天厝式集居方式，到公寓式已漸小家庭化，家族為之離散，但仍可能居住於同一社區。高層大廈的居住形式，則使家族徹底支解，關係冷漠，如同西人。

小家庭化與個人化的居住空間，在品質上顯著提升，故國內室內裝修業發達已專業化，直接影響都市居民之品味與生活美感的建立。

2. 休閒生活環境的問題

一般說來，我國市民重視室內空間，視為地位之象徵，且對室內空間有不易滿足的需要，但對戶外空間，卻不願投注太多的關懷。

西方現代都市重視休閒生活，故設有各種大小的公園綠地以及廣場等，甚至以都市中每人分配的公園面積為評量生活品質的標準。我國都市計畫雖亦有適當比例之綠地面積，但常由公共設施所占用。我國新開發地區先由民間進行開發，公共空間留到最後，由於民間對休閒文化缺乏水準，政府與人民都覺留為綠地太過奢侈，很容易巧立名目移作他用，因此休閒用綠地非常短缺。以臺北市信義計畫發展區來說，就十分需要一寬大的中央公園。

即使公園的開闢，由於對樹木、草地有成見，很少有可與西方相比較的明朗綠色空間，所以大型的公園就有規劃的困難，以新公園即二二八公園為例，其中的機構性建築包括博物館、露天音樂廳就有數座，然後是亭臺或紀念碑之屬，市民所能使用的空間只有幾條鋪面的道路。即使是所謂森林公園的臺北市大安公園，也極少以自然景觀的觀點規劃一個美麗、親切的開敞空間，可與倫敦的海德公園相比較。我們常以紐約中央公園與舊金山金門公園比類，他們誠然在公園內容納了少數公共設施，但其面積之大則非臺灣任何公園能望其項背。

至於小型公園，則極盡建設之能事，在非常有限的面積中安排些鋪面與花臺，砌些石牆臺階，搭些花架，再加上兒童遊樂設備，硬體建設不但多，而且雜亂無章，真正的綠地已所剩無幾，只有靠樹木來充

場面。

歐陸的都市休閒空間以廣場居多，較適於人群活動性休閒，靜態者以露天茶座居多。即使在主要的街道上，常有寬廣的人行道，如同線型公園，可供市民漫步或喝茶。可是臺灣的城市沒有廣場的計畫。臺北市僅有日據時期的中山堂廣場較合乎條件，可惜此處已缺少市民活動的吸引力。新建之公共建築，如市政府大廈、火車站等，都不曾考慮市民廣場，只見車水馬龍，對市民休閒生活毫無幫助。市政府前雖於週末封閉道路，供市民使用，但圍封不良，缺乏休閒之動機。如同西門町，雖有步行道之設，但街道空間及兩側之建築並無休閒之吸引力。

3. 觀光環境的問題

國人的習性是戶外休閒環境並不重要，但觀光環境卻受到重視，平日喜歡室內活動，上流社會流行室內機械運動及SPA等，但到假日則必出外旅遊，要求得到狂歡式的滿足。因此每到假日，公路與鐵路均擁擠不堪，自上世紀末即有國際流行之遊樂園等民間設施，但整體說來，觀光文化仍有短缺。

首先，自然景觀受到破壞。觀光環境中最重要的一環是大自然創造的特殊景觀，國內景觀專業人員的素質，多不能兼有景觀鑑賞家與工程師兩種素養。優秀的景觀規劃者必須是詩人、畫家，有掌握大自然美感的能力，還要同時兼有工程師的知識，能維護自然生態，不作過度開發。國內每有風雨之災，自然景觀即受到破壞，實因漠視景觀與生態之有機關係所致。

其次，文化景觀未受重視或流於俗。文化景觀有兩大類，一為傳統建築式聚落，一為宗教性民俗環境，前者由於政府與民間未盡保護之責，即使經由正式保存者，也難免新舊雜陳，古味盡失，殊少觀光價值。以古建築最豐富的鹿港為例，使國際人士聞風而來者感到失望。後者因由宗教團體主導，品味水準低落，每每重宗教信仰，或自信仰活動中斂財，並未顧及其高級文化或審美價值。故熱鬧有餘，文化性不足。我國傳統上以佛寺為知性觀光景點，但因各山頭主持者無建築素養，近

年來所建寺廟鮮有對訪問者有開啟胸懷之作用者。

(四) 臺灣環境品質的根本問題

綜合以上對臺灣環境問題的分析與討論，可以把環境品質的問題整理如下。

大體說來，環境品質的影響因子，可大分為實質條件與人文條件兩大類。

臺灣的問題大多為人文因子，在此簡略說明實質條件的影響，再仔細條列並說明人文因子的影響。現代科技進步，實質條件已逐漸轉變為由人力可以解決的問題，故也漸漸人文化了。

1. 實質因子的影響

環境的實質物理因子，可以大分為氣候因素、地理因素，這兩者又是相互關聯的。首先是土地狹窄的問題。此問題轉變為人文現象就是人口密度過高，是環境中最顯著的影響因子，而臺灣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

由於土地狹小、地價昂貴，建築的密度就會過高。健康又合理的建築環境是需要足夠空間的。現代主義的時代，高唱的口號是「陽光、空氣、綠地」，就是以廣闊的空間為條件。後來世界各國政府都規定建築的間距，就是勉強應合此一理想的措施。西方國家以美國為首，大都市的中心區都有土地狹窄形成的問題，但在市中心之外，大多土地充足，在居住區擁有理想的環境條件。

由於土地狹小造成的問題是建築面積的需要壓倒建築表現與都市景觀的需要，因此違章建築橫行。民間用盡方法與建築法搏鬥，使建築率、容積率僅供參考。廣場、綠地等在臺灣是很奢侈的字眼。

其次是氣候條件。臺灣位處亞熱帶的大陸邊緣，是氣溫偏熱，且會出現高溫的地區。每年有相當長的時間室內悶熱，不宜居住。加上建築密度高，通風不良，因此臺灣的居民為解決此問題，忽視建築在視覺景觀上的條件。早年的鐵窗柵欄就是為了夜間開窗降低氣溫而發明的辦法，形成都市景觀混亂的重要因素。後來經濟條件好轉，冷氣機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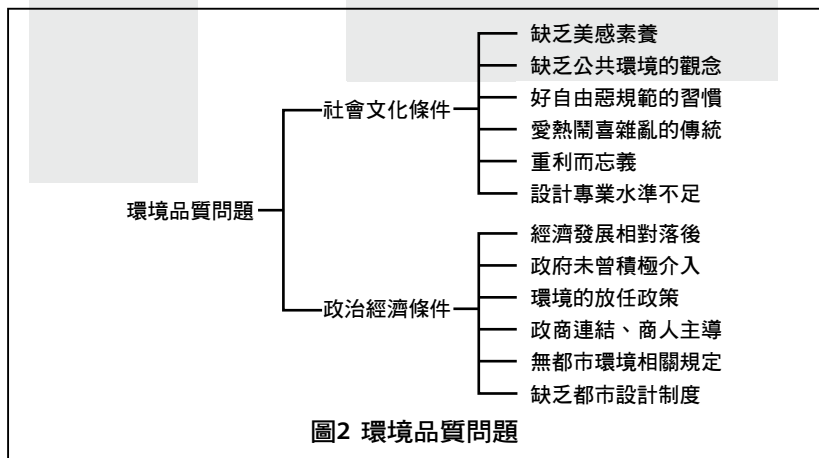
懸吊於窗外的冷氣設備又成為建築外觀的殺手。這與歐美地區以暖氣設備為主的氣候條件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他們的壁爐煙囪是建築與都市景觀的正面因素。

臺灣的地理環境是多地震與颱風的地區，對早期的建築有相當的影響，建築的壽命預期甚短、維修費用甚高、不宜高樓等，使臺灣很難保存古代的建築，一旦條件允許即急於改變為新式樓房。臺灣的環境缺少歷史感，其因在此。今天的臺灣以半世紀前日據時期的城市為歷史依據，也是因為日本人帶來的建築技術迅速為臺灣人所接受的緣故。進步代表安全與穩固。

氣候條件對清代木建築之保存同樣有不良之影響。古建築因多雨、潮溼而多蟲、霉之害，大多要經常修繕，因此臺灣很難見到真正的古建築，大多經過一再翻修，古意盡失。多雨加上空氣污濁，對於城市新建築也形成外觀髒亂的主要原因。

2. 人文因子的影響

環境建設是人文現象，實質因子都要人文的力量去因應，所以總結的說，環境品質問題都是人文的問題。本節將剖析這些因素，以討論因應之道。要較詳細的檢討千頭萬緒的人文環境問題，先列表如圖2。



3.政、經條件的影響

在環境品質上，經濟的條件是很基本的。回顧歷史，傳統的農業時代的環境是完美的。西方世界以二百年的時間，逐漸轉變為工業社會，大體上說，過程順利、美好。二十世紀中葉以後，落後國家卻面臨迅速都市化、工業化的問題，對環境造成極大的衝擊。農業時代環境品質遭到破壞，新秩序無法建立。經濟情勢造成都市貧民窟，對環境無從顧及。這個過程視經濟發展的速度決定其長短，而對經濟快速發展的地區來說，時有人文條件無法配合的問題，形成生存環境在視覺上的災難。

臺灣是比較幸運的，因已歷經半世紀日本統治的現代化過程。此段過程雖嫌緩慢，卻邁出了第一步。戰後略有停滯，到七〇年代開始快速發展，進入發展中（developing）的階段。歷經四分之一世紀，進入工業國家的行列。可是這二十幾年間是臺灣環境快速發展，而缺乏人文背景配合的階段，留下今天臺灣環境的種種缺失。

後工業時代來臨，高科技帶來的財富使建築的環境條件提高，此時因貧富不均的情況加劇，富有者開始建造高價位、高美感條件的高層建築，但一般平民仍居住在發展中階段建造的環境中，因此整體環境條件並無顯著改善。而高價值的高層建築，因人文條件未盡完全配合，環境品質與國內當代環境仍有相當差距。

相反的，商人力量高漲，金權的影響力使政商結合，對土地開發者予以很多方便，不惜犧牲市內、市郊的環境品質。市內者，高層建築的建蔽率以各種方式突破，政府以各種方式給予容積獎勵，社會成本則由大眾負擔。市郊者，則予以非都市地區之便利，准予建造高層大樓，破壞自然景觀之美。

另一方面，政府則以不多問聞為政策。在威權時期，當政者為營造親民的形象，對下層社會民眾的行為多所包容，在環境方面之違法事件多不追究。民主化之後，更因選票決定政權，當政者有討好大眾之

傾向，因環境品質之敗壞為基層大眾所營造，故亦多所顧忌。甚至有防火巷被堵塞之情形，政府亦視若無睹。至於掩護不合環境發展原則之開發，更為政府一貫的態度。

由於這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政治風氣，對於都市環境景觀最有相關性的都市設計一直沒有制度化與法制化。臺北市只有一個行政命令，稱為「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查辦法」，它是都市計畫法規下的一個審議辦法，不可能有決定性影響，沒有積極的實施市內景觀設計的制度。市政府的一些相關政令，大多與人行道或與開放空間有關，無涉於城市景觀。

至於為維護市區建築的完整性與市區環境的寧靜等，除了土地使用的規定外，並沒有詳細的執行辦法。因此在住宅區開商店幾乎沒有限制可言，工業區亦可建住宅與辦公大樓。都市環境在失控狀態。

4. 社會、人文條件的影響

人文條件是國人行為模式對環境的反映，形成對環境品質的直接影響。這種行為模式是承接傳統而來，所以是一種民族特質。它是代代相傳，在潛移默化中學習得來，所以帶有民族性，亦帶有農業時代的行為特色。我們的傳統，以熱鬧為喜慶事，熱鬧必然嘈雜，嘈雜必然紊亂，因此在環境上為了熱鬧並不排斥紊亂。這是全球中國城的共同特色。士林夜市之成為觀光客喜愛的「景點」，就是因為反映了國人的民族環境特色。過去臺北圓環是同類的環境，卻因改建為一個超現代的玻璃盒子而窒息了它的生機。

國人是喜歡守規矩的，喜歡個人的自由，只受權勢的約束，這是中國傳統社會的行為模式。到了現代民主社會，很難維持社會秩序。若沒有公權力，就有黑社會的力量出現。在建築與環境上，挑戰法規，自由搭建被視為當然。國人對自己的私密環境是非常在意的，因此中產階級以上居住集合住宅，必於住宅內大肆裝潢，甚至破壞公共設施如垂直管道亦在所不惜，務期室內與眾不同。這是歐美所沒有的現象，故我國

室內設計業一枝獨秀，專業之盛甚至超過建築設計業。但在室外與公共空間，除高層大廈外，多無人管理，任其破損。此種缺乏公共環境的觀念最常反映在四、五層公寓之翻修上。各戶獨自行動，鮮有集體的修建活動，因此有外牆亦以各層為單位改裝者，使建築之外觀如百衲衣，形成世界奇觀。

這樣的建築環境可以顯示地方的生命力，但無可諱言的，是難民戶時期的延續。市民無環境美感的意識，以爭奪空間自求生存為第一要務的時代遺留。這樣的精神狀態，使「發展中」時期的建築，盡其可能向公共空間爭取空間掌握權，除了戶戶有屋頂加建外，不占建蔽率的陽臺必加窗以增加室內空間。在窗臺外凸出鐵柵，以便放置花盆或雜物，志在占有公共空間。這些都使臺灣的都市景觀成為奇觀，具有全球的獨特性。政府若干年來，從未採取任何行動。

整體說來，中產民眾的居住環境仍停留在開發中國家的水準，即使在經濟上已超越貧窮，但心態上仍未改變。即使擁有昂貴的市中心居住空間，除非改建為大廈，心態仍然是貧窮的，根本問題之一是，過去半世紀以來國民的美感素養未有效提升。國民仍以金錢價值為基本價值標準，把貴的認為等同好的，沒有辨別美、醜的能力。文明社會中「高雅」的觀念，是文化的標竿，不幸在我國已完全消失。古人文人雅士的風範，樸實生活中尋求美感的觀念，已被我們遺忘，使得居住環境呈現如非豪華即屬雜亂的二分現象。

以建築為例，設計專業水準因經濟條件好轉而有所提高。但商業建築喜走風潮，及以集中大量建築為時尚，使新的中產階級居住環境單調而缺乏生氣，走入另一極端。此為二次大戰後，西方國民住宅式的居住方式的移植，是臺灣城市很不幸的發展。商業開發過分重利，莫此為甚。他們完全丟棄了空間設計的生動的一面，只是為充分的過量利用土地，犧牲居住者的生活品質，使建築徹底蜂窩化。

綜上所述，可知臺灣的居住環境文化，除了過分商業化的新開發區

之外，是以新舊雜陳的景觀為主，有待今後數十年努力，才能逐漸演化為和諧、安靜、美觀、高雅的環境。這不是自然發展而成的。以目前的狀況，商業開發為主要的推動力量，則城市的偏頗發展是可以想像的。沒有政府領導人的高瞻遠矚，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光明的前途。

可是在選票主導的政治氣氛下，政府能改變態度，指出積極的發展方向，制定有效的管理辦法，使城市環境的未來走上正軌嗎？舉例來說，我們可以期待不久的未來，有約制過多機車與廣告的政策出現嗎？實在是值得懷疑的。

二、生活文化方面

（一）生活文化的意義與範疇

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幾乎分不開文化與其他層面相互浸潤的關係；換言之，生活中處處表現文化的意涵與價值，食、衣、住、行、育、樂各層面都隨時反映文化的發展層次與風韻特色。以飲食而言，烹調、器皿、飲料（酒類）、餐室布置與其氣氛，甚至盛宴的禮儀，無處不是文化的反映。故宮博物院經常展示很多宮廷中使用與飲食有關的銅器、陶瓷器固然是文化，沉船打撈上來的民間餐具或外銷歐洲的「貿易瓷」亦是文化；至於各國佳肴料理，包括法國菜中形形色式的品酒文化，三、四百種的乳酪（cheese）文化都是在生活中發展出來的資產。所以可以概括地說：文化表現於生活，生活就是文化的體現。生活文化是顯示一個族群或一個地區文化特質的發展層次很重要的指標。文化從較抽象的層面看，固然是一些符號、理念、價值、態度和知識系統，從具體而微的角度去評析，也是展現一個地區或一個族群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秩序、品味與美感」（沈清松，一九九三）。中國哲學會曾接受行政院文建會委託研編《現代國民生活文化手冊》，計畫主持人沈清松教授在《文化的生活與生活的文化》報告中指出：「文化是一個歷史性的生活團體表現其創造力的歷程與結果，其中包括了終極信仰、觀念系統、規

範系統、表現系統和行動系統。」（沈清松，一九九九）。從這個定義出發，該一報告將生活文化涵括若干特別重要的層面：信仰生活、知識生活、倫理生活、藝文生活、行為與生活（例如國民是否守時守法、是否有公德心、是否關心社區參與、消費行為是否奢侈等等）。李亦園教授在一篇檢討文化指標的評估（李亦園，一九八九）文中，將文化指標區分為「文化活動指標」、「文化環境指標」及「文化素養指標」三項。文化素養指標又進一步分析為「欣賞的素養」、「創新的素養」、「消費的素養」以及「人生的素養」四種，以利「質的文化指標」分析。由上面討論可知，生活文化乃是文化發展與文化特質的反映，可以透過若干量的或質的文化指標加以評估。要討論臺灣文化的遠景，無可否認的，生活文化是環境文化之外的另一重要向度。

（二）生活文化與主觀幸福感的關係

文化因素在分析國民生活素質時之所以如此重要，在於文化是一般民衆主觀幸福感或生活滿意度的關鍵因素（Diener, E. & Such, E. M., 2003）。一個國民平均所得較低的國家的老百姓，不見得比高所得國家的老百姓不幸福，或其生活滿意度會較後者為低。這乃是這兩個國家的文化因素（特別是生活文化因素）不同使然。最常被引述的例證是喜馬拉雅山麓小國布丹（Bhutan），布丹政府強調用快樂指數來代替國民所得或國民生產毛額等經濟指數以度量國民的幸福感。這固然是布丹這個佛教文化浸潤很深而近乎遺世自立的小國家尚未受到「永不滿足的人類貪婪」（insatiable human greed）所感染（轉引自The New York Times，《聯合報》精選，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九日），所以在生活上「淡泊寧靜，知足常樂」。這正是當前歐美心理學漸趨顯學的「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一再強調的「幸福感來自主觀滿意度」的道理。近年來美國不少名校，包括哈佛大學在內，相當熱中於為大學生開「如何活得更快樂」之類大學本科通識教育課程（譚家瑜譯，二〇〇八）。正向心理學大師賽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等所指的「真實的快樂」

(authentic happiness)，並不一定靠禪修之類冥思沈靜練習獲得，或藉助迷幻藥物的沈醉、求一時的興奮與快感，有相當部分幸福感是文化因素使然，也就是人情味、人生觀、價值觀、文化素養、終極信仰、社會關懷、倫理關係……等等因素。許多「泛文化的SWB學術研究」(cross-cultural study of subjective well-being)指出，主觀的幸福感與一個人的自我觀念(Self-concept)、人生目標、倫理溫情、終極信仰有關，而且與一個人的文化素養及道德修養也有密切的關係。以前者而言，懂得品酒、品茗、品賞佳肴的人不單是有口福，也較能在日常生活中獲得滿足，享受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所謂的「高峰經驗」(peak experiences)；同樣的，懂得欣賞視覺藝術之美的名士也較有眼福；懂得鑑賞音樂的愛樂人士較有耳福，這些有口福、耳福、眼福的人，就是文化素養較上道、能領略風花雪月之韻味的文人雅士。其實，現代的文化人也不一定限於喜愛古典的、高雅的文化產物、熱中流行音樂或一些後現代藝術的，同樣的可以「游於藝」而相對地較不在乎物質生活的享受。從人格修養角度言之，心理學家也發現具有懂得感恩、關懷、尊重、包容、節制、自律等人格特質的道德人，也就是較重視一己的社會義務與倫理責任的人士，較能「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就像顏淵一樣，「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所以受到老師孔子的讚美。相形之下，一味追求聲色犬馬之娛的享樂主義者就較缺乏這種主觀的幸福感，甚至其滿足欲因慾望膨脹而越難有快樂感。

(三) 生活倫理是生活文化的基礎

倫理係指人際相處應遵守的規範，也是做人應有的道德義務。從社會心理學的概念言，生活倫理乃是指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實踐的角色行爲。角色原是戲劇中的辭彙，一位演員在一齣戲中，扮演何種角色，就需要將這個角色附帶的一整套行爲模式依照劇本的要求在舞臺中演出；在現實生活中，角色行爲係由社會習俗及文化規範所制訂。人生如戲，每個人在其一生中的不同社會情境要扮演許多不同的角色，包括

性別角色、親屬關係的角色（為人父、為人子女等等）、職業角色（教師角色、部屬角色、總經理角色、監察人角色等等）、社區或社群角色（鄰居角色、朋友角色、社會領袖角色等等）。透過這些角色行為，人際之間乃有互動關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須依照倫理規範，表現符合社會期待的正當行為。傳統的社會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五倫之間的道德規範，如父慈、子孝、兄悌、弟恭、媳順之類角色規範，維繫了社會秩序的和諧；現代民主社會雖強調自由、平等、正義、寬容，仍然有一套公民守則。在一般家庭生活倫理之外，同樣重視職場工作倫理、社區群居倫理（例如公寓大廈住民應有的行為規範），邇來生態環境倫理也受到關注。所以倫理道德的範疇雖然因時代環境而有所變異，例如過去沒有電梯，當然不需規範坐電梯的角色行為，現代生活中無論坐電梯、搭乘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皆須實踐一套行為規準（例如乘客先下後上）。又如傳統社會中，五倫是倫理道德的主體，但是現代人每天面對的卻是陌生的群眾，沒有五倫關係的關係人，在人際交接時當然也需要一套行為規範的約束，這是李國鼎、孫震、王昭明等賢達提倡「第六倫」或稱群己倫理的原因。在當前社會生活中，群己倫理的「群」範圍相當廣泛，有些群眾是面對面的關係，例如同車乘客，有些群眾卻是從未謀面，例如電話禮貌的對象、網上交談的網友，而在實際倫理生活中，後者較前者尤為重要。因為在「匿名化」、「虛擬化」與沒有「見面三分情」的情況下，倫理規範的約束力特別薄弱，所以電話詐騙、網交無禮、「比鄰若天涯」（大廈居民的衝突）層出不窮。因此，討論生活倫理這樣一個議題時，倫理道德的範圍就須擴及整個現代生活的各種情境，公德心、專業倫理、保育倫理（天人合一、永續發展的觀念）顯得特別重要。

為什麼生活富裕並不必然會使人有幸福感？為什麼這麼多海外歸人回到國內定居，是因為喜歡這裡的「人情味」？為什麼不少人感嘆居住在繁華的都會環境中，反而沒有心理上的安全感？為什麼許多大陸客

到臺灣來印象最深刻的是搭高鐵捷運時，車上乘客的輕聲細語、上下車的井然有序，特別是年輕人懂得將「博愛座」讓位出來？為什麼日本人的生活文化經常被引述或稱讚？（日本人的生活禮儀，特別是禮讓與口頭用語，相對較為講究）。為什麼越來越多的憂道人士，感嘆師生關係正在變質，學校中的尊師重道傳統隨著校園文化的解構而有逐漸淪喪之虞？毫無疑問的，當生活倫理失序，生活文化也自然隨著扭曲，這個社會的生活品質也必然丕變。以臺灣而言，今後十年正面對這樣一種社會變遷的衝擊。

（四）藝文生活與生活品質

過去行政院主計處經常進行一般民眾「時間運用調查報告」（沈清松，一九九三），將國民每日二十四小時生活作息的時間分配分為三個部分：「必要時間」（用餐、睡眠、盥洗等）、「約束時間」（就業上班、上學上課、料理家務等）以及「自由時間」（可自由支配、從事育樂休閒活動的時間）。一個人平日對其自由時間如何分配利用，從事較有意義的休閒、娛樂及靈修活動，關係到這個人的生活品質。如果就整個地區或國家的國民休閒活動類型分析，自由時間的運用情形也反映出該一地區或國家的文化品質與藝文發展水準（Donnat, O, 2003）。因此，藝文生活不僅是評量文化品質的指標，更是探討國民文化素養與文化品味的門徑。

一個地區的民眾是否將相當高比例的自由時間投入藝文活動，牽涉到很複雜的因素，至少包括（1）消費者本身的藝文素養和消費類型，以及（2）該地區提供藝文消費的機會、成本或供應條件等兩方面的因素。就前者而言，各個年齡群的消費者對藝文活動的需求及愛好類型頗有差異。一般而言，較高齡者傾向於在家看電視、聽廣播、讀雜誌、觀賞傳統曲藝的錄影帶，也偶爾上歌廳聆賞老歌，或到博物館及文化中心參加活動。至於青少年消費群則傾向上網聆賞流行音樂、看影片及新聞性論題文章，有機會時也參加大型藝文表演活動，特別是熱門音樂會。也有部分個性較內向的年輕朋友喜歡陶醉於圖書館或氣氛較佳的書店

（如誠品書店）的書堆中，消磨大半天的時間。當然也有極少數藝文消費者本身從事文藝創作、表演、推廣教育的工作。

從後者供應面觀察，藝文活動的參與除了消費者的興趣、素養及消費能力（經濟能力及自由時間的多少）外，當地藝文展演場地是否充足、藝文活動是否蓬勃、消費成本是否低廉（例如消費者要否付出昂貴票價及來回交通費用）、節目宣導與行銷是否足夠、政府有否優惠及鼓勵措施、是否有經常性或定期性的藝術季節活動、圖書期刊出版資料及新聞傳播媒體網絡是否取得便利、日常新聞媒體報導中是否經常報導或評析藝文節目，凡此種種因素皆影響到藝文活動的消費面。法國一項研究指出，法國民眾的自由時間（抽樣調查）於一九八六年有44%用於看電視，到了一九九八年則提高到53%（Coulangeon, 2003）。臺灣地區的民眾情形如何，有待資料佐證。但是不少收視節目調查分析指出，近年電視節目中政論評析充沛，每天吸引大量觀眾收視；電視普及早期雖時有特別叫座的連續劇節目，卻非持續不斷。所以國內民眾在每日自由時間消耗於看電視（中年以上）及上網（青少年）應該占有相當高的比例。此一印象，尚待相關普查驗證。但是不可否認的，由於每個人日常可運用的自由時間有限，不同類型的電子文化消費彼此之間有其相互排斥性，藝文節目在國內電視頻道中的地位也一直屈居弱勢。

一個國家藝文活動的蓬勃發展，政府扮演相當關鍵性的主導角色，特別是場地設施與經費補助方面，責無旁貸。各類博物館的關設、地區文化中心功能的充實，劇院、音樂廳、藝廊、文化園區、展覽館、社教館、小劇場的規劃增設，皆有助於提升社區居民的生活文化品質，應該列入國家中長程發展計畫中規劃，這就是文化建設的最基本要求。

（五）靈性修行與生活文化

一個有深度的文化體系通常有其終極信仰的次系統。所以沈清松教授等研討「質的文化指標與生活文化」時，將信仰生活與知識生活、倫

理生活、藝文生活、行為與生活並列，指出「終極信仰是指一個歷史性的生活團體之成員，由於對人生與世界的究竟意義的終極關懷，將自己生命所投向的最後根基」（沈清松，一九九九）。

臺灣地區在地文化的發展有一股不可忽視的能量，此即宗教文化，或稱之為靈修的生活文化。雖然臺灣各地廟宇林立，本是承接自中原文化的傳統，但是佛教的入世化與人文色彩的彰顯，卻是臺灣在地文化的成果。慈濟、佛光、法鼓、中臺、靈鷲……等佛教門派無不勤於耕耘文教事業，將救濟與傳道並列，逐漸蔚成臺灣在地宗教信仰的特色。在此之外，另有一股不可忽視的靈修風氣，成為在地生活方式的清流，包括吃素、禪修、瑜珈、基督教的查經靈修、天主教的輔諮服務（偏重超個人心理學的終極關懷輔導與意義治療）。國內不少民眾或許平常沒有踐行一般教徒的宗教儀式，卻是很重視靈性修行的生活規範，除了經常素食養生外，在閱讀自修方面也特別偏好靈智開悟、生命淨化、關懷倫理、內在能量的開發、探尋超我的人生、信奉真我的價值等主題。風氣所及，這些靈性信奉者自然無形中減除社會上瀰漫的暴戾之氣、怨恨之情，更有益於靈修者接納自己，開拓內在喜悅的人生，讓個人生命進入自由自在、心安理得的靈性面。靈性的英文名稱是spirituality，近年來心理學界又恢復重視人生智慧（wisdom）的開發與研究，靈性智能（spiritual intelligence）一詞跟一九九〇年代後期情緒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簡稱EQ）一樣，趨於流行。一個靈性智能較高者，除了有較豐富的靈性生活外，在人格特質方面較重視終極關懷的思考，較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較能體認人生無常、環境變遷的現實，較能在名利追逐上割捨，生活上也有較豐富的高峰體驗（peak experiences），較能接受生命過程中的違逆與痛苦，對終極信仰較信守不渝。

在舉世為生態環境惡化、氣候變遷而惶惶不安之際，臺灣民間這股重視簡樸生活、生命淨化、社會祥和、自我探索、心靈虔誠的能量，應該珍惜蘊育，進一步開拓擴大。無論靈性生活的理念是來自傳統中國的

天人合一，或是印度靈修文化的影響，也可能容納西洋基督教的義理，臺灣社會的核心價值在科技、商業與政治層面之外，非常需要吸收更多人文的、道德的及哲學的成分，或是偶爾超越現實的思索與反省。目前國內大多數民眾在靈性修行方面，雖然尚未成為其生活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學校課程中已開始有生命教育的議題，禪七之類靈修活動在大學生社團活動中也相當流行。總之，信仰生活的角色在政府文化政策中沒有理由不加以重視。

參、政策建議

一、環境文化——政府能為環境品質做些什麼？

環境是最複雜的文化產物，其品質的難以控制是不言可喻的。在古代，都市環境的架構都是自上而下、由具有政治領導力的哲人所建立。中國自古就有王城之說，唐代之長安，元明清三代之北京，都有明確的架構，不但建立了權力的象徵體系，對民眾生活所需的設施、宗教崇拜的場所均有一定的位置。西方世界在中世紀原是以教堂為中心自然發展的，但現代城市中的前身，巴洛克城市的空間架構則是與專制王朝之統治相關，若沒有王權，則不可能在密集的城市中開闢寬廣的廣場與大道建造富麗的宮殿。今天看到的巴黎是這樣建造起來的，其實我們所熟悉的臺北市何嘗不是在日本專斷統治下所關建？他們的模式正是十九世紀歐洲的巴洛克城市。

相形之下，今天的民主制度所產生的政府，在新城市環境的建設上就有無力感了。

（一）決策者的見識

首先需要政治家的決心與遠見。在如此艱困的景況下，如果在位者沒有提升民眾精神生活品質的決心，對環境品質沒有認識，即使為文化編列更多的經費，也不過辦更多活動，討好民眾於一時而已。文化經費最容易為從政者所利用，作為變相的競選經費。

只靠領導者的識見是不夠的。在民主制度之下，任何重大改變要形成共識，需要執政黨的政策支持，才能在國會中形成力量。這是最困難之處，很顯然並非一朝一夕之功。國家領導人不但要有識見，而且要有足夠的魅力與智慧，運用追隨的民眾的向心力，塑造對環境願景的期待。在初期，擬定步驟，以行政運作逐步實施。

（二）國民的美感教育

教育為百年大計，其效果非短期可以見效，故常為從政者所忽略。

但有識見的領導者要對國民素養有所貢獻，非自教育入手不可。要提升環境品質必須期待三十年到五十年的努力，自國民環境教育開始，勢在必行。環境品質教育是美感教育的一部分，我國的美育一直沒有認真實施，對環境與生活美感更是完全忽略。教育部雖一度提出「藝術生活」的課程，卻未能實現。

在歐美，國民多能對居住環境中之重要建築與歷史古蹟如數家珍，都是源自於中學教育的美育課程。這種教育可以養成民眾對建築藝術的認識與尊重，實為生活美學的奠基工作。在國家文化建設上，這是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的事，但我們已延擱了一個世紀，至今尚無開始的跡象。可惜政治人物對美感缺少反應，而無所覺。

美感教育必須在國中到高中的階段實施，藝術教育課程要以工藝與設計教育為核心。西方在十九世紀就是通過美育來提升勞工階級的精神層次，視工作為心靈的投注，才能保證工程的品質，美感教育由此可與中世紀的宗教精神相連結。這就是蔡元培希望以美育代替宗教的緣由，可惜我們至今沒有推動的計畫。

因此責成教育部認真研究國民生活美學的教育是根本大計，配合文建會推行的生活美學運動，形成正式教育與非正式教育的聯合陣線。為完成此一目標，教育部應專設美感教育的專職單位，與藝術教育劃分，或在藝術教育中另設分支組織。目前教育部所組織之藝術教育委員會鬆散而無決策力，對於生活美學之推動很難發生效果。

政府也可以在專業教育上加以關注。建築的專業教育逐漸受當代風潮的影響，走向形式的表現與裝置藝術的影響。這固然是教育界的自由，但以國民生活環境著眼，當代建築是破壞者、過分的英雄主義色彩，未顧及一般民眾的心理需要。

今天的環境專業教育所需要的是公民設計（Civic Design）的訓練。在臺北市這樣的首善之區，人行道尚不能鋪平、騎樓下步道尚高高低低的今天，談當代的形式只是譁眾取寵。先要提高步行道的品質，才

能使市民感到起碼的自尊。市政建設的重點要自最基本處做起，最缺的就是公民設計的人才。沒有關心市民生活環境的官員，三令五申都沒有用。

專業教育要通過高等學校執行，這方面教育部很難施力，但可以專案計畫的方式，鼓勵各大學建築系開設公民設計的課程，對臺灣現城市之諸多弊端進行研究，提出解決方案，並與地方政府合作進行研究計畫。大學建築系可以組織社區服務團隊，幫助民間改善居住環境，包括市街景觀整理等，可逐漸引起社區民眾的興趣與對環境的關懷。

至於政府可以直接執行的環境提升作業，分別說明於下。

（三）公共空間設計的規範

與都市公共空間相關的設計，最重要的是新開發地區與更新地區的設計，因為這是政府可以用法規來控制的。要點是訂定法律，允許先有設計，亦即三度空間的規劃，再循序發展，否則必然受商業開發的拖累，終於雜亂無章的境地。臺北的信義區就因無設計構想、無主要的開放空間，因而缺少中心區意象，只有商業大樓與商店街。

其次是市街的設計規範。臺灣的城市以街道為主要組成元素，市街之美觀對城市之品質影響至鉅。因此我們需要一個有法律位階的辦法，對市街的建築有所規範。自垂直面看，要控制招牌與廣告的設置，建立建築與建築間的和諧關係；自水平面看，保證走道的平整與安全。市街應考慮立體的關係，在重要地區允許跨越街道，以交換地面的公共空間。如有可能，創造端景應列為優先。

最後是開放空間設計的規範。臺灣極少開放空間，有之也沒有極盡其用，大多委由民間設計，或由公務員執筆，缺乏公民精神。臺北市政府前的空間就是最缺乏公民性的例子。公民性就是市民喜歡逗留的品質，不論是硬面的廣場，或軟面的綠地，總以創造市民心目中「戶外客廳」的感覺為上乘。臺灣完全缺少這種經驗，少數的公園都沒有空間構想，只是堆積植物而已。近來政府推動綠建築，有生態

綠地之說，可在公園中設生態區，但應分開生態公園與市民公園的意義，不可混為一談。

（四）公共建築與公共藝術辦法的執行

在環境品質中，地標性的公共建築居於重要地位。巴洛克式城市，在視覺焦點設置重要公共建築，是城市美化的主要手段。以日治時期的臺北市來說，總督府在主要道路之端點，博物館在站前主要街道之端點，是最典型的例子。臺北市政府之坐落亦屬同樣觀念，但在建築的設計上缺少都市景觀的思考，建築外觀毫無公民性可言，實在可惜。而臺北市的新建火車站，完全沒有景觀的思考，只是一個龐然大物而已。

公共建築的公民性除內部空間外，其一是坐落的位置，其二是外形的凸顯與象徵。我國現行制度為採公開比圖，因此擬定完善的比圖辦法是非常重要的。比圖的成敗，在於事前評圖標準的確立，與評審委員的選擇。我國政府的比圖辦法是自欺欺人，大多為安排的結果。只要評審委員近半數為機關內人員，即知無選取優良的誠意，何況機關大多無能力準備評圖準則。採購法形成極大的障礙，應予修改。

自從實施強制設置公共藝術辦法以來，執行與評選公共藝術的方法是大有問題的，所以極少看到可以改善或增進都市景觀品質的作品，相反的，破壞建築環境者居多。公共藝術並非獨立雕塑作品，而是附屬於建築空間或建築體的藝術品，因此公共藝術必須以建築為基礎，其設置原則與評審準則必須有建築家的參與甚至主導。臺灣的公共建築水準不高，建築師又無參與表示意見的機會，希望由藝術家提升其品質，大多情形是適得其反。

（五）建築外觀與屋頂管理的準則

一般民眾的居住環境，以建築外觀之視覺秩序最為重要。這是數量龐大的背景建築與無名建築，但卻是大部分市民起居於斯的環境。所以真正屬於民衆的環境品質，乃普通居住建築及其巷道的空間品質。

背景建築並不重新奇的造型、炫目的色彩，而以質樸實用為本，但建築的外觀宜以和諧為準，雖不引人注目，卻謙和可親，雖不華麗，卻潔淨宜人。要在臺灣做到這一點，一方面要推動全民美育，一方面要以法律作規範，規定建築物依法建成不可改變，街面與屋頂非經申請不得變更。這是在先進國家不必法律規定都自然遵守的原則，我們則必須用法律強制才能做到。

屋頂的問題比較複雜，在過去樓梯公寓時代，習慣上屋頂屬最上層所有，所以最容易加建。加建的理由在早期因平屋頂的隔熱、防水的功能不佳，住戶不得不加建簡易斜屋頂以求解決，後來則加強、增高作為增建空間使用，因此一發而不可收拾。目前已成全國性現象，必須等待全面改建為高樓時才能消除。但如能立法促使民間逐步申請合法化，方可縮短全面消除屋頂違章。

（六）市區機車量的逐步限制

臺灣地區的都市環境惡劣，與機車氾濫不無相關。臺灣已成為世上稀有的機車王國。大陸經濟與都市發展均落後於臺灣，但早已限制機車在城市內的活動，而機車是發展初期的交通工具，卻適合我們國民追求隨意生活的民族性。發展至此，幾乎已到了無法遏止的程度，是民主政治制度下的一大毒瘤。

機車在城市中至少造成兩大問題，其一為空氣污染，其二為交通混亂，均對市容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臺灣各城市的空氣相當污濁，大多為汽機車的排氣所造成，機車之害尤其嚴重。空氣污濁使建築物的表面容易沾污，外觀顯得骯髒不堪，難以入目。在首善之區的高樓大廈，在建成數年之後即有立面污穢出現，因此多數大樓均用暗色面材以遮醜。立面的油污不容易清洗，使臺北蒙羞。

至於交通，可分兩方面說。一方面是交通秩序。機車被國人視為方便的交通工具，既可被視為汽機車在車道上開，也可在小巷中自由逆

向駛行。另一方面，在臺北市，為了解決大量機車的停駐問題，允許在人行道及騎樓下停駐，因此使人行道成為機車合法的通道，不但行人的權利被剝奪，人行步道亦因而骯髒、紊亂，嚴重破壞市景之面貌。都市交通原本應以大眾運輸系統為主要工具，私人轎車應為不得已才使用之工具。國人習慣使用方便的機車，使公車與地下鐵都很難經營。這是高雄捷運嚴重賠累，難以為繼的主要原因。

政府應該擬定逐步排除市內機車的計畫。提高機車稅捐、限制牌照數目、嚴格檢查排氣污染量為前期可採之手段。進一步可縮減機車產量、禁止機車街頭停車等，逐漸使民眾感到必須負擔機車的社會成本，而放棄使用機車。

二、生活文化——政府倡導生活品德的可行做法

雖然當前資訊流通全球化，一般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從報刊、電視、網路及社交接觸多元管道取得資訊，也受到形形色式輿論及民意傳播的影響，欲期政府以注入式行銷方式提倡一些生活改造或道德復興的運動，未免受到譏評。但是有些政策相關部會，類似內政部、教育部、文建會、新聞局等等，倘若因而不再關注國內生活文化改善的課題，就似乎太無為而失責了。尤其是決策主導人士與社會名流的言行舉止，常曝露於螢光幕中，或為新聞報導的焦點，頗收風行草偃的效果。除了宜避免錯誤示範外，倘能配合政策導向，成為引導社會大眾生活革新、人格遷善的楷模，蔚成全面社會風氣的趨向，將可帶動一股清新的文化氣息。

（一）全家性活動的鼓勵措施

家庭倫理為生活倫理的基石，發展心理學的研究印證幼年期的親情照顧（maternal care）、兒童期的親子關係、青少年期的家庭關係，整個社會化過程對每個人格的塑成具有重要的影響。不少青少年犯罪的文獻也常指出：少年犯特別常見的特徵是缺乏全家性活動，即使是出身

富裕家庭，也常因父母各有其私人交際生活，難得有全家一起出遊或週末共同的休閒活動。全家性活動反映出一個家庭倫理關係的親疏，家庭成員如果經常在一起用餐、閒聊、玩樂、運動、出遊或家長為子女溫習功課，或者是一道看電視而由長輩隨時對節目作詮釋，電視對兒童的影響也較能減少一些消極的效應，尤其是面對暴戾或違背倫常的情節為然（郭為藩，一九九三）。

國外交通單位為鼓勵全家性同出旅遊，對夫婦、親子或全家數人同乘的旅客常有優待辦法，例如法國國內航公司票價、高鐵或火車票價對全家一起出遊購票亦有鼓勵性的折扣，至於文化育樂機構或園區對家族同遊的優遇更是普遍。一九八〇年代後期，行政院文建會曾提倡「家庭日」、「全家一起來」的運動，將每個月第二、第四週的星期日訂為「家庭日」，要求各縣市文化中心配合舉辦活動，鼓勵為人父母者扶老攜幼，特別是家長帶未成年的子女到館參加藝文表演活動，進而帶動其他民間文化館舍亦共襄盛舉，希望可形成一種週末全家外出參加藝文活動的風氣。當時文建會除了對各地文化中心的「全家一起來」親子藝文活動有專款補助外，並策劃辦理「民間劇場」、「歌聲滿人間」、「文藝廣場」活動，鼓勵「全家福」（當時常使用的口號）男女老少一起參與親子藝文活動，以敦睦家族關係（郭為藩，二〇〇九）。

報載，教育部邀集縣市政府研議，規劃將每年八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訂為「祖父母節」，鼓勵當日為人祖父母者與孫子女多多相處，並指示教育部直屬館所於是日配合舉辦活動，免費招待祖孫同遊，增進三代間互動機會。此一政策出發點，據稱是基於目前國內十二歲至十八歲年齡層的青少年中，有七成以上表示祖父母是他們幼年時的主要照顧者；又美國從一九七八年就立法訂定九月第一個週日為祖父母節，通常長大成人的孫子女輩亦可趁此節日邀約長輩同餐共遊或致送禮品。由此可見，家庭倫理的提醒仍然可以列為政策性措施，透過訂定節日或制度化的定期活動，強調「全家福」的意義。

中國大陸因為七十年代以後推行計畫生育的政策，逐漸出現人口「老齡化」與「少子化」的社會問題，形成「養四老一子，夫妻壓力超大」的情景，所以報刊以「獨子養老時代來了，獨生子女苦啊」為標題（《聯合報》，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其實，臺灣對生育人數雖無限制，近年國民家庭生育率已低於平均1.2人以下，少子化與高齡化社會的嚴肅問題已亮起紅燈。此一形勢除了「獨子養老」的問題值得關注外，家庭倫理的問題（例如沒有兄弟姊妹的平輩倫理關係）以及照顧高齡父母的孝道倫理，也漸成為文化政策必須正視的課題。

（二）現代生活禮儀的宣導

傳統的中國歷來都自許為禮儀之邦，歷代政治體制中的禮部實質上就近乎今日各國的文化部，在其職掌中最重要的是國家的禮制及民間的禮俗，推行禮儀教化於庶民。禮部固然負責皇室的祭祀大典，也重視一般老百姓的倫理規範及風俗厚薄。因為禮儀乃是依人情義理制定的行為規範，與道德相輔相成，「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篇》）。在現代生活中，一個社會的禮俗雖然不同，但是生活禮儀的規範必然存在，特別在中上層社會為然。所以類似「英國公學」（public schools，實為貴族化的私立學校）一向以培養社會俊彥為目標，平常在生活教育方面管教甚嚴，以期所有學生將來都是紳士（gentlemen）或仕女貴婦（ladies），雍容大度。我國傳統的學校教育，實施禮樂射御書數的文藝教育，同樣強調溫良恭儉讓的君子風範。這種禮儀教育的傳統延續到現代學校中的公民與道德教學，以及平日的學生訓導活動，生活禮儀的要求仍然被視為倫理道德涵養的基礎，不容懈怠。

然而，生活禮儀的內容與準則是隨著生活環境而調整的，當一般民眾的生活方式有所改變，禮儀規範也需要修正或充實。例如早期沒有電梯，自然沒有乘坐電梯的禮儀，而今日都市環境中，大廈公寓不能沒有電梯，電梯的禮貌自然需要講求。汽車多了，除了坐車席位的禮節外，

也強調開車人的駕駛禮儀（例如國外一向強調禮讓行人先過馬路、不亂鳴喇叭，又如在公共車輛上對老弱婦孺讓座等等）。當前的大眾生活，外出到餐廳用膳相當普遍，用膳的食桌禮儀趨於複雜，而且中式與西式餐桌禮儀也有差別。至於在餐廳中不高聲交談，在西方社會也至為重視，國人出國旅遊，自須入境問俗。同樣的，出席音樂會、參加婚喪儀式，以至於社交書函往來，皆有禮俗規範，否則除了貽笑大方，且會因失禮而損及人格形象。

越是國際化的社會，生活禮儀越是顯得特別重要，因為國外旅客來臺，不但基本禮貌不可或缺，而且尚牽涉到生活品德的一些要求，例如對多元文化習俗的尊重（不宜少見多怪，形諸於色），容忍因禮俗差異的舉止、避免種族歧視或文化本位的成見，以及講信用、守承諾、準時赴約之類品德。很多國家在辦理大型國際活動時，往往對舉辦地的居民有國際禮儀的宣導，理由亦在此。另一方面，隨著國民出國旅遊人數劇增，國人在海外的風度與行為表現，當然要展示國民的教養與生活品德。所以禮儀教學除了平時在學校相關課程中應予加強外，將來的文化部也須將國民生活禮儀的倡導視為正常業務的一部分。

過去文建會為改良婚喪禮俗，曾製作婚禮音樂與喪葬音樂錄音帶推廣民間利用，希望透過禮樂（主要以國樂搭配）的制訂，帶動婚喪禮儀的莊重化，可惜效果未見彰顯。今後對於改良禮俗與生活禮儀的活動，自應多與大型寺廟、教堂及公益社團（如獅子會、扶輪社等）合作，也許更能獲致預期效果。生活禮儀的調整與宣導乃是長期性的任務，並非立竿可以見影，如果能獲得社會標竿人物的支持、率先示範，當較易帶動社會新風氣，使臺灣人更接近禮儀之邦的水準。

（三）社會藝術教育納入終身教育網絡

藝術教育在國內一直局限在學校系統內，以專業藝術教育言，除了三所國立藝術大學外，師範教育系統（包括教育大學、臺南、臺東兩所大學）也都設有音樂與美術系所，培育藝術師資。此外，中國文化

大學的藝術學院及升格未久的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也培養劇場藝術、傳統戲曲、民俗技藝方面的專才，就整個體制言，可稱相當整備。目前特別需要加強的是跨領域的文創專業人才，例如多媒體藝術、電影電視節目製作、音樂廳管理、美術館經營、動畫製作等等專才的培育。臺灣的藝術教育在中小學階段尚有相當基礎的藝術資賦教育體系，納入特殊教育法監督的範疇。國中、國小的藝能資優班偏重音樂方面的表演藝術及美術實作方面。此外，高級職業學校也有若干表演藝術科、戲劇科、舞蹈科、電影電視科等，尚未受到社會的普遍重視。

學校系統的藝術教育一方面受教人數究竟有限，且以走上專業生涯為教學目標，目前甚至有供過於求、人浮於事的就業問題存在。但是從生活文化的角度觀察，社會美育的宣導卻相對被忽略，不僅在公共媒體方面績效未彰，而且離校後的社會人士如果想自行進修藝術知能，自修途徑相當艱辛，特別是個別指導的鐘點費甚為高昂，超出一般中低收入家庭所能負荷的程度。雖然近幾年來各地社區大學開設藝術教育的課程漸趨普遍，可是仍以入門知識的講授為主，並且是在班級教學中進行，距離歐洲式的社會藝術學苑（academy）有一段相當的差距。歐式藝苑係小型社會藝術教育機構（例如奧地利在音樂方面就有三、四百所），有意進修的社會人士或各級學校學生，均可到這些公辦或由政府補助的私立藝苑學一種樂器，或進修作曲理論、練習聲樂、自修素描技法、學攝影、舞蹈基本技巧，且可參加技能檢定，取得分級認證。社會藝術教育與專業藝術教育的主要差別在入學是自由的（不經入學考試），且無年齡的限制，通常以小班級教學為主要形式，同一班級學生程度也不見得很整齊，但是對於藝術知能的普及，尤其是藝文觀眾及聽眾的培育，間接奠定專業藝術發展的基礎。不僅因而培養出廣大的藝術消費群，而且在自修大眾中常有才華優異的藝術家脫穎而出，受到賞識、發掘、培養而躍登明星行列。

文建會在一九九二年向行政院提出且奉核定的「國家建設六年計

畫」中，列有「藝苑籌設計畫」、「文藝之家籌設計畫」，後者係屬作家聚會的文藝沙龍，曾在臺北市中山堂試辦未果，與社會藝術教育沒有關聯；前者則是小型藝廊，且兼有社會藝術教學的功能，後來此一計畫不了了之，沒有推動，至為可惜。另有社會戲劇教育的「民間劇場」推廣方案，也是成果不彰。稍後，文建會大力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且有「地方文化館」的設置；雖然以展示地方文化特色藝品為主，部分地方文化館至今尚未能發揮原期許的功能，受到「蚊子館」之譏，值得進行評鑑檢討。必要時地方文化館轉型為社會藝術教育的機構，或許較符實際需要。

二〇〇八年，教育部將原有相當規模的四個社會教育館（臺南、彰化、臺東、新竹）移交文建會管轄，文建會並將這些存在數十年的社教館改稱「生活美學館」。此一新意固然與該會提倡生活美學相符，但是對於館內專業社教人員而言，頗感不知所措，捕捉不到業務重點，生活美學至今仍停留在理念層次，不像「社會教育法」及相關政策有較明顯的政策方向及實施策略。為了迎合終身教育成為全球教育新潮流的大勢，教育部另頒有「終身教育法」，倡導終身學習。其實，社會藝術教育原為終身學習一個核心領域，文建會的四個生活美學館不妨納入社會藝術教育的系統，與推廣學校藝術教育的國立藝術教育館並列，再結合部分地方文化館的轉型，形成一個全國性的藝術教育網絡，提供全民在藝術知能領域的進修機會進而配合制度化的分級檢定與認證，若干年後對國內社會美育與生活文化的發展，相信將有深遠的影響。

（四）加強政府贊助、舉辦及參加文化賽會的拔尖功能

公元七七六年在希臘伊利斯城邦開始舉行的奧林匹克競技賽會，固然是祭典儀式後的競技活動，也配合多項詩歌朗誦與舞蹈表演，後來成為一種傳統，定期舉辦，所以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及閉幕時，總配合精彩絕倫的藝術表演。至今各類運動大會除了拔擢田徑及球類運動明星外，另一不可忽視的功能就是為主辦國家創造體育運動與藝文活動的

高潮，而世界許多國家也透過衛星電視，分享這些體育與藝術盛宴，而且也為參賽揚威而培養出各類運動的優越選手。同樣的道理，包括奧斯卡金像獎、柏林影展、威尼斯國際影展、法國坎城影展以及不計其數的電影展，同樣兼具文化盛宴及選萃拔尖的雙重功能。每次賽會結束，就產生出許多影壇新秀，脫穎而出。在藝術方面，同樣有蕭邦鋼琴大賽、伊麗莎白小提琴大賽等等，每年賽會固然是當地愛藝人士的盛會，也培養出多少寒窗苦練的音樂家，如鯉魚跳龍門，立刻身價百倍。有很多藝文節慶活動，即使未分名次，同樣具有上述雙重功能，例如每年七月的法國亞維儂藝術節（一九九八年國內有八個團隊參加）、奧地利薩爾斯堡藝術節、英國愛丁堡藝術節等等，不但是世界媒體聚焦的藝術舞臺，而且是各國藝術經紀人物色優異團隊與之簽約的熱絡市場，很多國際級表演團隊及閃耀藝壇的明星，也透過這些機緣及管道受到星探與國際藝評的注目。因此，多姿多采的藝術季節活動是許許多多藝術家，特別是才華待露的新手夢寐以求的龍門，然而總是因為經費短缺或門徑未通而苦無機會參加，有時成為終身憾事。

文建會多年來執行「扶助國際團隊補助計畫」，對國內重要團隊如雲門舞集等少數卓越團隊頗有助益，但是因為僧多粥少，補助資源仍然有嚴重不足的歉憾。其實，國內主辦藝術賽會，例如二〇一〇年蕭邦誕生兩百週年時主辦國內蕭邦鋼琴大賽，主辦單位一直深受財務拮据所苦，無法辦理出一個國際大賽級的規模。所以政府的適時奧援仍然是具關鍵性的。另一具體例證是宜蘭童玩節，因每年縣府需貼補五千萬預算而停辦的殘酷事實，結果使得這樣一個人人叫好的藝術節慶活動叫停。童玩節倘若能加入一些團隊比賽的成分（例如國際兒童劇團或兒童合唱團賽會），或許可以使此一年一度的盛會具備多元功能，兼有人才選拔的效果。

過去國內有若干藝文性的大型活動，相當風光，成為媒體焦點，然而因維持不力，久而久之漸有淪為「例行公事」的年度活動，例如電影

金馬獎在不少影迷心目中即有此感覺。另有一些國際藝術賽會，由於政策搖擺，缺乏穩定的主辦單位，常受到主政者職位異動或預算無著落的影響。例如文建會的民族工藝獎，原是對傳統工藝人才具有激勵作用的定期盛會，可惜斷斷續續，後繼乏力。期待政府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在獎勵工藝產業的同時，有餘力辦好這樣一個國際性的展覽，足以吸引許多國家的工藝名家提供作品參賽，使它成為兩年一度的工藝盛宴，也讓民族工藝的新秀有一舞臺可以展露身手。

總之，舉辦此類大型文化節慶或賽會，單靠民間社團籌辦，人力與財力均難承擔，皆需政府強力奧援與協助。至於國內團隊出國參賽，文化團隊宜視同體育團隊的參加運動賽事，從寬編列預算支持。除了為國爭光，多數藝術家或其團隊的脫穎而出，在其專業領域揚名國際，通常須透過這類拔尖賽會的考驗與加值，才能慢慢走入明星級的坦途。

（五）推廣簡樸而富文化氣息的國民生活方式

當全世界輿論焦點集注於丹麥哥本哈根的氣候變遷與節能減碳議題時，地球上的多數國家，從政府、議會、學術界以及社運團體，都懷著一種等待災難迫近的憂惶，討論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以拯救全球生態平衡與抑制氣溫繼續升高的嚴肅課題。從環境文化與生活文化的角度申論，當務之急似乎應該回到個人的人生信念本身及調整生活方式的議題。像沒有簽訂「京都議定書」的消耗能源超級大戶——美國，家家戶戶還是二、三部大型舒適耗油車長途奔馳於四通八達公路上；當美國的都市設計仍然是星羅散佈的伸展方式，出門不開車就無法購物訪友；當美國家庭的餐飲方式，特別是美國文化表徵的麥當勞、肯德基等速食店，那種暴食豪飲的飲食文化（較典型例子是可口可樂等飲料可無限續杯、自行添加而不加價）繼續浪費無度的流行，節能減碳依然還是奢談。美國飲食文化相對於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等地中海式的食譜與食量，國民生活方式在節能減碳上的關鍵性不言而喻。所以「抱璞歸真」的核心價值，「自求簡樸」（voluntary simplicity）及「培養感受生活恬美

的醒覺」(wake up and live)，才是從生活方式節能減碳的康莊大道。簡樸的生活方式雖然要付出相當程度從消費中獲取快感不足的代價，但是尚能配合生活步調上調整節奏，消費者在生活品味上將相對提高同類物資消費的回饋量。多少人在現代忙碌生活中「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無法體驗飲食與周遭景觀聲色的歡愉，所以林語堂先生在其不朽名作《生活的藝術》書中指出：「我認為文化本來就是空閒的產物，所以文化的藝術就是悠閒的藝術。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凡是用他的智慧來享受悠閒的人，也便是受教化最深的人。」（林語堂，一九七六）。生活方式的改變對文化觀光也有助益。例如近年來發展出義大利的「慢城運動」(slow cities movement)，一些能讓遊客發思古之幽情的小城，調整城裡食宿生活的步調，讓遊客充分體驗恬靜、悠閒、人情味及慢食的樂趣，吸引了許多追求靈性的文化觀光客，此類觀察在節能減碳上也有深刻的意義。

對物質消費需求的儉約應該是自發的（非因外律的強制）（Elgin 著，張至璋譯，二〇〇八），基於真誠的自制（常常節制儉約能殊途同歸，達到消費更多物質一樣的滿足度，如同素食者與葷食者一樣可滿足食慾），特別是當事人若是基於對人生價值的體會與環保意識的覺認時更是如此。探索新生活方式，實踐尊崇自然、愛護生命的具體行動，漸成爲新「天人合一」的生活哲學。雖然推廣生活簡樸運動非單靠文宣活動可以勝事，也無理由要求主政者或是社會名流像陶淵明一樣過淡泊人生，但是老百姓心目中的標竿人物倘能多參與有環保意義的藝文活動，在日常生活中多表達關愛大地、親近自然的態度，特別是實踐自奉儉約（如故總統蔣經國先生）的生活哲學，減少在奢華婚喪宴會中曝光，進而以身作則、重視休假與周末中的家庭生活，盡可能冷卻選舉文化的熾熱，強調多元多采的人生價值，引導全民一起探索悠然自得的田園樂趣：爬山、泛水、運動、旅遊，以及自古以來文人墨客鍾情的琴、棋、書、畫等等，或可望改變社會風氣。此外，鼓勵各級學校加強文雅教育

（liberal education）課程，在大學教學卓越評鑑中關注通識教育及藝文社團活動，督促地方政府積極推展社會藝術教育，支持文化觀光措施，當能為節能減碳開闢另一條有效的途徑。



肆、目標設定

文化與藝術發展範圍廣闊，且多數業務不容易以計量的指標來評估其進度與實際成就。然而為掌握文化發展規劃的進程與方向，一般文化行政機關仍然習於訂定短中程文化發展計畫，從事「目標設定」的工作，俾能確立努力方向，並利施政計畫與預算編製。至於文化發展的長期規劃，通常見諸於文化領域的白皮書，或於全國文化會議中列舉揭示（國內於一九九〇、一九九七、二〇〇二曾分別舉辦過全國文化會議），民間社團亦常見有文化願景的論述，代表藝文界對政府施政方針的期許與推論。

一、政府機關近年設定的發展目標

行政院文建會雖然每年在向立法院施政報告中皆列有施政目標，不過這類目標究章是年度性的。例如二〇〇九年度的施政目標，黃前主委碧端曾提出：（1）推動組織改造，充實文化設施；（2）扶植文化產業，形塑文創品牌；（3）規劃「文學著作推廣計畫」，提升閱讀風氣；（4）活化文化資產，厚植觀光資源；（5）推動臺灣生活美學運動及公共藝術再造計畫等施政重點。類此施政目標雖稱為年度目標，其實要看出具體成效，仍然是跨年度的，必須持續性的努力。談到中長程計畫，迄今尚未見政府機關有較明確的文化發展藍圖公布，即使是第三次全國文化會議係以「新世紀的文化願景」為主題，亦未見於會後整理出中長程發展計畫，經行政院的審議後正式公布。不過，文建會確於二〇〇四年（亦即全國文化會議）召開兩年後發表一份《二〇〇四文化白皮書》（文建會，二〇〇四），於其第三篇以「挑戰與願景」為題，提出十大願景，包括（1）成立以文化為主的首席部會；（2）定位文化新價值，制訂文化新政策；（3）提高文化經費達總預算2%（約三百億）；（4）建立文化主體性；（5）充實文化設施；（6）興建新十大建設，包括北、中、南、東四個國際藝術級流行音樂中心、大臺北

新劇院、臺中古根漢美術館、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故宮南院、南島文化園區、世界文化館等，充實文化設施；（7）發展文化創意產業；（8）培育文化藝術人才；（9）營造社區新故鄉；（10）推動國際文化交流。時隔五載，再觀諸以上十大願景，對政府在推動文化政策的績效，或許會有見仁見智的評價。

其實，更早的文化發展長程計畫要提到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文建會向行政院提出的「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文化建設長期展望」草案～一九九二～二〇〇一年。這是一個跨越十年的方案，當時只列舉總目標六點，包括（1）推展現代社會倫理，建立祥和社會；（2）善用社會資訊，充實精神生活；（3）美化生活環境，提升生活品質；（4）獎助藝文創作展演，提高藝文水準；（5）促進區域的均衡發展，邁向國家文化均富；（6）加強文化交流，共創世界新文化。展望報告也提到基本策略十四點，分別是：（1）重視區域均衡；（2）結合民間資源；（3）獎助文化藝術；（4）宏揚人文精神；（5）導正社會風氣；（6）更新生活方式；（7）融匯文化源流；（8）兼顧傳統創新；（9）充實文化設施；（10）改善文化環境；（11）善用文化資產；（12）調適人文科技；（13）健全文化行政；（14）培育文化專才。此一長程發展計畫因為行政院始終未曾正式核定，文建會也未正式公布全案詳細資料，所以類此文獻只能視為當時主政者的政策構想而已。

二、文化願景 —— 二〇二〇

為配合本章的撰述，曾於二〇〇九年十一、十二月間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第一會議室，舉辦系列六次講演與討論，總主題訂為「營造美好臺灣——文化願景二〇二〇」，分別就文化資產與生態保育、表演藝術、臺灣地區城鄉規劃、博物館事業長期展望、歐洲文化城市風格、文化創意產業等議題，邀約馬以工、朱宗慶、夏鑄九、張譽騰、邱大環、黃光男等教授專題講演，並與聽眾進行討論。該項摘要記

錄一俟整理完成，當另專篇印出，供大眾參考。就白皮書撰稿人綜合各方觀點，一般藝文界人士樂見國內文化建設能在今後十年加速發展，並在下列方面有具體成果。

(一) 配合文化全球化與兩岸關係發展，研擬完成臺灣地區今後十年文化發展中長程整體計畫，由即將成立的文化部據以有效推動：文化部業務職掌在原議範圍外最好能納入文化觀光、傳播事業與建築管制三部門。上述中長程發展方案，期待新文化部於成立後盡快籌開第四次全國文化會議，並於會前舉行分區座談會及相關主題研討會，廣納各方意見，訂定論述主軸及其題材，再經大會進行研討。第一次中程計畫執行結束後，期中允宜再有一全面評鑑與再檢討的機會，作為該長期方案中期修正的參據。

(二) 文化創意產業的國際化，宜視為臺灣發展文創產業的主要方針：國內文化消費市場究竟有限，而文創產業倘非大規模生產，難以達到國際競爭所需具備的最低經濟規模，此一道理在電影業（包括動畫）、電視節目與音樂影帶業、工藝產業、時尚品牌產業、書刊出版產業、遊戲電玩軟體設計業皆然。特別是部分文創產業的主要消費群在華語中文市場，更需積極開發對岸市場，所以在法令規章與資金配合上，自應有適度鬆綁的措施，人才培育方面亦不宜故步自封。

(三) 扶植更多國際級表演藝術團隊應列為文化部當務之急：過去文建會扶植國際表演藝術團隊（如雲門舞集等）已有相當成效，但是國內團隊有機會參與世界性知名度高的藝術季節活動究竟仍然有限，有待開發如愛丁堡藝穗節、薩爾茲堡藝術節等新市場。因此，今後政府在國際藝術交流方面的財務支援及新團隊的培植亟須積極進行，期待十年後臺灣知名團隊有二、三十隊在這些國際藝術節慶經常出入演出。

(四) 強化終身學習系統中的藝術教育：面對少子化及高齡化社會的來臨，今後十年中各級學校的學生來源將受到結構化的影響，特別是私立學校系統為然，但是以成人教育（包括高齡學習）為主的終身學習

體系，將成為學校體制中越來越受到重視且日漸制度化的一支。終身學習就課程言，除了各類專業學識與職場核心能力的補充與加強外，藝術教育在未來重視文化陶冶的新世紀，勢將成為全民終身學習的主流之一。

（五）設立全球均佈之文化傳播系統：接近十億的華文使用人口將成為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來最重要的溝通語文。就華語使用人數言，且超過英文、法文與西班牙文等，臺灣的公共媒體與出版事業如何在華語文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例如有二十四小時播出的電視新聞系統（類似美國的CNN、英國的BBC、法國的TV5等等），如何有全球布點分布的書店兼視聽出版品（假設誠品書店力爭上游成為國際級的跨國公司），政府在文化政策上的輔導與貸款扶助，（如同泰國政府對海外泰菜餐廳的政策配合措施）實不可缺。國內同胞在今後十年將因國際化而更多短期出國機會，足跡遍布全球，華語文媒體能否提供就近利用與經常收視的方便，勢將成為海外華人文化認同的課題。

（六）增建文化設施為觀光據點並振興文化產業：臺灣地區雖然幅員不大，但是就文化觀光資源而言，仍然略嫌不足。具有較高號召力的博物館（如同故宮博物院、臺中自然科學博物館、屏東海洋生物博物館）屈指可數，大型演藝廳堂（如中正文化中心兩廳院）及具觀光兼紀念性建築（如臺北市國父紀念館）也為數不逾十處。因此，今後十年內樂見規劃中的文化觀光據點（如高雄衛武營演藝中心、故宮南院等）能次第完成，並盼望有至少十所中型新博物館的出現，在收藏方面較有基礎的博物館（如臺北市南海學園的國立歷史博物館）亦宜有擴充計畫在二〇年代完成。此外，中南部增闢國際會議中心，扶助若干地區性藝術節慶活動成為每年定期舉辦或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國際性重要盛會（參與觀眾在百萬以上），亦期待觀光主政單位劍及履及在十年後做到。近兩、三年文建會利用廢棄廠房大力開闢文化園區（例如臺北市華山創意文化園區），樂見政府更進一步為振興地方文化產業大力投資此等園

區，於二〇二〇年前開花結果。但是賦予舊建築新活力，除了創意與善意外，主政單位應有眼光與魄力邀請富有園區總體設計的國際專家參與其事，並以地方文化特色包裝。適於開發的閒置空間究竟有限，投資不足，就很難成大器，豈不可惜。

二〇二〇年被歐美許多國家視為二十一世紀另一新階段的開始，亦成為重要長程總體規劃的收成與銜接點。值茲歲序更新之時，衷誠祝福二〇一二年開張的行政院文化部政務推展順遂，大展宏圖，為關心新世紀文化建設的藝文界人士實現願景。

參考文獻

- ◎大前研一，二〇〇九。「形塑生活者大國」。臺北市：《天下雜誌》。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二〇〇四。《文化白皮書，二〇〇四》。臺北市：編著印行。
- ◎沈清松，一九九三。「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意涵」。收於《民國八十一年度中華民國文化發展之評估與展望》（頁一五三～一九二）。臺北市：行政院文建會。
- ◎沈清松編，一九九九。《文化的生活與生活的文化》。臺北縣，新店市：力緒文化。
- ◎李亦園，一九八九。「若干文化指標的評估與檢討」。收於《民國七十七年度中華民國文化發展之評估與展望》（頁三三～七四）。臺北市：行政院文建會。
- ◎林語堂，一九七六。《生活的藝術》。臺北市：遠景。
- ◎郭為藩，二〇〇九。《全球視野的文化政策》，第二版。臺北市：心理出版社。
- ◎郭為藩，一九九三。「電視對兒童社會學習之影響」。收於郭為藩編著，《科技時代的人文教育》（頁二九九～三二〇）。臺北市：幼獅。
- ◎張至璋譯，Elgin, D.著，二〇〇八。《自求儉樸》。臺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
（原書名：Voluntary Simplicity）
- ◎漢寶德著、黃健敏編，二〇〇六。《漢寶德談文化》。臺北市：典藏藝術家庭。
- ◎漢寶德，一九九二。「都市發展的文化觀」。收於《民國八十年度中華民國文化發展之評估與展望》（頁三九～六八）。臺北市：行政院文建會。
- ◎漢寶德，一九九一。「臺灣當前建築藝術之評估」。收於《民國七十九年度中華民國文化發展之評估與展望》（頁一二九～一七八）。臺北市：行政院文建會。
- ◎譚家瑜譯，Ben-Shahar, T 著，二〇〇八。《更快樂：哈佛最受歡迎的一堂課》。臺北市：天下雜誌。（原書名：Learn the secrets to daily joy and lasting fulfillment）
- ◎Coulangeon, P. (2003). Le poids de la télévision dans les loisirs. Evolution de 1986-1998. In. O. Donnat (Ed.) Regards croisés sur les pratiques culturelle. (283-299). Paris: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 ◎Diener, E. & Such, E. M. (2003).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Donnat, O. (Ed.) (2003). Regards croisés sur les pratiques culturelles. Paris: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 ◎Droege, P., 2006. Renewable city-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an urban revolution. UK: Chichester: John Wiley.

| 召集人簡歷資料 |

郭為藩

最高學歷：臺灣師範大學碩士、法國巴黎大學博士

現職：臺灣師範大學名譽教授、總統府國策顧問、中正文化中心（兩廳院）董事長

經歷：臺灣師範大學校長、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教育部部長、中華民國駐法、荷蘭代表

重要著作：《全球視野的文化政策》、《轉變中的大學——傳統、議題與前景》、《成人學習——心理學的探討》、《自我心理學》、《特殊兒童心理與教育》

漢寶德

最高學歷：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碩士、普林斯頓大學藝術碩士

現職：世界宗教博物館榮譽館長、漢光建築事務所主持人、總統府資政、文建會顧問、教育部諮詢委員

經歷：東海大學建築系系主任、中興大學理工學院院長、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臺南藝術學院校長、中華民國博物館協會理事長、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重要著作：《建築的精神向度》、《建築、社會與文化》、《築人間——漢寶德回憶錄》、《中國的建築與文化》、《漢寶德歐洲建築散步》、《漢寶德談美》